

著夫嶽田小
譯泉范

魯迅傳

店書明開



魯 迅 傳

小 田 磯 夫 著
范 泉 譯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魯 迅 傳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

每册定價國幣一元三角

| | |
|-----|-----------------|
| 著者 | 小田嶽夫 |
| 翻譯者 | 范泉 |
| 發行者 | 開明書店 |
| 印刷者 |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老版
 下
 上
 中
 下
 早

魯迅遺像

及其致內山完造的最后遺墨

謹以此書獻給

夏丏尊先生

我流了感激的眼淚，翻看着留在
譯稿上的夏先生的手蹟。想不到

這個集子出版的時候，夏先生已

永遠不再和我們見面了……

范泉 一九四六年八月

關於「魯迅傳」

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工作上，魯迅是中國人民大眾的導師；在進步的文化藝術的創造工作上，魯迅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質的世界性的文化鬥士。魯迅的影響於中國的文藝青年，影響於被侮辱被損害的無產階級，影響於全世界的閱讀魯迅作品的讀者羣，非但在範圍上異常廣泛，抑且在程度上異常深邃。同時，更由於魯迅思想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因素，所以它不僅影響到我們的一代，也將影響到以後的無數代，不單是中國民族細胞永遠需要的營養，也必為全世界各民族爭取進步的文化鬥爭過程裏不可缺少的一支動力，一個學習的標幟，一種戰鬥的典範。基於這樣的理由，所以我們可以說：魯迅是具有世界性的偉大的不朽的作家。

我們應當慶幸這樣的作家在自己的民族隊伍裏成長。但隨着時代的進步，新的舊時代的礁石也會不斷地成長和被發現，過去，魯迅用文化的武器曾經無情地毀滅了這些舊時代的礁石，然而魯迅死後的今天，新生的舊時代的礁石非但要阻撓我們前進的徑路，也還有意損害着魯迅的已成的功績。許多人屈服於礁石的下面，許多人助長了礁石的威力，許多人曲解了魯迅，許多人污辱了魯迅。這是現實的危難。然而我們不能低首於這樣的危難。反之，我們要拾起魯迅遺留下的武器，貫徹魯迅的戰鬥精神，突破這現實的危難，對於舊時代的礁石給予無情的毀滅！

研究魯迅並發展魯迅的戰鬥精神，這是我們當前唯一的文化課題。我們要發掘魯迅真正的思想，學習魯迅的戰鬥藝術，發揮並加強魯迅的戰鬥工作。在魯迅的豐富而精粹的文化遺產面前，在魯迅的堅定而深切的思想面前，我們要使舊時代的礁石遭到悲慘的命運。

到今天為止，魯迅逝世已經將近十個年頭，然而有系統地將魯迅的思想，藝術和生活剖析和研究的著作，除了平心的「論魯迅的思想」和巴人的「論魯迅的雜文」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比較正確的專集。倒是一些有意歪曲的空談主義者，常常以一知半解的口吻，用淡淡的閒情來議論着魯迅的短長，藉以增高自己在文壇上的地位。這種卑劣的謀略家正需要我們用切實的工作來答覆他。我們要用謹慎的態度從事切實地研究，我們要介紹中國以外的比較有價值的有關魯迅的著作。豐富研究魯迅的資料，集合一切可恃的著作來保衛魯迅！

「魯迅傳」便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翻譯過來的。自然，由於魯迅思想的廣博，由於原作者在人事和地域上的隔膜，小田獄夫的一魯迅傳，可以說，是有着不少的嚴重錯誤的。爲了避免對於魯迅的誤解，譯者邀請許廣平先生加以詳細的校閱。許先生曾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紙片記錄下來，賜贈譯者加以改正，並且當面又獲得不止一次的解釋。而在原著的引述魯迅原文的地方，曾向許先生借閱「魯迅全集」，一律照錄原文。爲了拙譯的校閱和原著的訂正，許先生曾奔走了兩次，並惠贈參考的書籍，對於這樣一位熱心的指導者，我不能不在這裏特別提出，並表示無限的謝意。

其次，是在翻譯本書的時候，「魯迅全集」的發行人黃幼雄先生剛巧和我同在一個企業公司裏擔任職務，所以凡是遇到不熟習的地方，他總以和魯迅同鄉的資格，用親切的口吻，講述着魯迅的故鄉以及魯迅的祖父所以下獄之類的故事，這裏雖然限於譯文的體例，不能把我已知的材料一一加以補充，但由於黃先生的指示，使我避免了原著的若干錯誤，這也是我應當在這裏鄭重致謝的。

對於一位民族巨人的傳記，在內容上，應當是包涵了這位巨人的思想，藝術和生活的各方面

的。小田嶽夫的「魯迅傳」，顯然在這些工作上還相隔着很大的距離。但是就原著的寫作內容看來，我們可以揣測：作者對於魯迅的著作確曾下過一番研究的苦心，以一個和魯迅素未晤面的外國人的資格寫成了這樣的一部傳記，那應該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罷。

在中國，創作的「魯迅傳」以前也曾商請茅盾先生執筆，但是茅盾先生祇熟悉魯迅的後半部生活，前半部尚待許壽裳先生的講述。為要寫成一部包含魯迅整個思想，藝術和生活的傳記，所以經茅盾先生鄭重考慮以後，覺得不能草率從事。後來戰事遽起，這部書便也中途擱淺了。

如今翻譯了小田嶽夫的「魯迅傳」，斬割其曲解和不必要的部分，成為現在這樣子，正是因為：一面要豐富研究魯迅的資料來保衛魯迅，一面卻藉此機會，拋磚引玉，在沒有完整的正確的創作本「魯迅傳」嘗試寫作以前，先鉤勒了一個「魯迅傳」的輪廓，讓我們自己的嘗試者獲得某種程度上的便利和參考。

許廣平先生說：「魯迅先生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也因此，無論是誰，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總不能够全面的，而只是理解了他某一個部分，他們的觀察祇局限於某一個角度。至於日本人方面，以為增田涉氏和魯迅先生來往很密，而且為了『中國小說史略』的講解，會接受魯迅先生當面的長時期的指示，但他也不過對於中國古文學方面發生了興趣，自然不能理解魯迅先生的全部思想。又有人以為內山完造氏是魯迅先生的活字典，其實在許多的地方，他也是不能夠理解魯迅先生的思想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與譯者的談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虛假。而從這些話我們也可以知道：要為魯迅先生寫傳記是一件何等艱困的工作，但我們，顯然又不能因為工作的艱困而停頓下來，——這正是雖然在內心並不感到絲毫的滿意，但終於草率地將這譯本出版的原因。

目 次

| | |
|------------------|-----|
| 序 章 | 一 |
| 清代 | |
| 第一章 幼年及少年時代 | 九 |
| 第二章 日本留學 | 二七 |
| 第三章 鄉里生活 | 二九 |
| 辛亥革命以後 | |
| 第四章 北京·沈默 | 三五 |
| 第五章 「吶喊」 | 四三 |
| 第六章 「彷徨」 | 四九 |
| 國民革命以後 | |
| 第七章 廈門行 | 五六 |
| 第八章 廣東受難 | 六九 |
| 第九章 上海生活(一) | 七四 |
| 第十章 上海生活(二) | 七九 |
| 第十一章 上海生活(三)——晚年 | 九一 |
| 第十二章 從萬國殯儀館到萬國公墓 | 一二三 |
| 附錄 | |
| 魯迅著作年表 | 一〇八 |

序 章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病歿了，享年五十六歲。上海發行的「文學」雜誌在同年十一月號即「魯迅先生紀念特輯」號裏，揭載了描寫葬儀狀況的明星電影公司攝影的幾幀照片。在把遺體從住宅運出來的照片上，跟在遺體後面的一個穿黑色西服的青年，手裏握着手帕掩蓋着臉；在從殯儀館把靈柩運出來的照片上，那扶着靈柩走下門口約有三級石階的，在西服上懸掛着喪章的幾個人的臉面上，充滿了嚴肅的哀愁；而在葬儀行列的照片裏，更可以看到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和宋慶齡的臉面。這些都不必特別提出來細說，但和這些照片同時並列的，有葬列出發前唱歌隊練習的照片，和葬列中用兩根棒高揭着魯迅半身大肖像而走着的照片，以及攜帶花圈的一隊，腳踏車隊，和行列中手持寫着各種標語的旗子的青年男女大羣集的照片，以文人的葬儀而有這樣的盛況，實在令人感到似乎是什麼地方祭典時的熱鬧的情景。真的，魯迅在某種意義上，是時代的英雄，受到這樣的待遇也許正是合適的。但我要說的魯迅的真相，不在於這些，而在另外的一方面。

一九一二年國民革命，其真正的重大意義，與其說是推翻了滿洲族清朝的天下，破壞了堯舜以來四千年的帝皇制度，則毋寧說是它否定了在這長長的歷史時期培植起來的根深蒂固的中國舊文化。這意義深長的大革命的最大建功者當然是孫文，現在他被神一般地莊嚴地供奉在南京的紫金山上，已經成爲四萬萬民衆的偶像，這恐怕自有其值得這樣崇敬的地方。而和這革命有牽關聯，與孫文同樣地不能忘懷且與孫文可以匹敵的重要的人物，便是這裏所說的魯迅這個人。

孫文是製造新中國的外表的人。而魯迅，同他比起來，卻是為製造新中國的實質而畢身忍受着苦痛的人。以具有龐大的四千年背景的中國，縱使外表被改革了，那實質卻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革。這是容易想像得到的。而這一點也正是魯迅的不幸。任何一件事情必須要有一個人開始，然後在這個人所播的種子上，再由其他的人加以肥料，這樣，種子纔遲早會開花和結果。這話不是對於中國民族的預言，而是指事情的普通狀態而言。

事實上，湊巧的是孫文和魯迅都是留學生。孫文的學醫動機，是由於他常常出進的廣東傳道會的外國人經營者是醫學博士，所以一半似乎是偶然的機緣，但關於魯迅的學醫，卻和改革中國有着很大的關係。他的西洋醫學救國的志願是非常著名的。

孫文在英領香港學習，和魯迅在日本學習，又是饒有趣味的類似的事跡。當時青年學生到外國留學，是遍中國社會的一種新的風氣，這樣的事實已明確地表現了否定中國舊文化的微候，所以想把古舊中國的根柢推翻而挺身出來的最最果敢的兩個勇士，都是留學生出身。

要是把孫文和魯迅的苦痛比較地看來，則孫文是樂天的，是剛毅的，是野心家，也好像是空想家那樣，所以也許把苦痛不覺得什麼苦痛，但魯迅的苦痛我以為是遠過於他，這並非是由於人的個性的問題，而多半是由於關心的事件的性質罷！有多數的同志分擔着苦痛，和常常不得不祇是一個人地苦痛着，雖然僅僅是這樣的差別，但這差別是非常的巨大。就在這樣的意義上，和孫文的總是滿身洋溢着光輝的時代英雄不同，魯迅則是一個寂寞的孤獨的時代的受難者。這樣的魯迅便和紫金山的壯麗的陵墓不同，他被悄悄地葬在上海郊外萬國公墓的一隅。這樣地寫來，讀者之中也許有人會懷疑他的文學家的地位了，但對於這樣的懷疑，我卻只能夠回答說：他是文學家。當然，文學家本來是思索着關於人生的人，然而他的思索的方法，不知怎的，和日本的文學

家們思索的方法似乎大相逕庭，不過關於這方面，在知道了本書中先後略略敘述到的圍繞於他的中國的環境，那麼一切的懷疑自會消失的了。

這裏有郁達夫把魯迅及其胞弟周作人作比較評論的文章。以下是關於魯迅的部分：

「魯迅的文體簡煉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祕訣。——次要之點，或者也一樣的重要，但不能使敵人致命之點，他是一概輕輕放過，由牠去而不問的。」(中略)

「兩人文章裏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魯迅的是辛辣乾脆，全近諷刺。」(中略)

「魯迅在日本學的是醫學，周作人在日本由海軍而改習了外國語。他們的篤信科學，贊成進化論，熱愛人類，有志改革社會，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張的手段，卻又各不相同。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爲玉碎的。」(中略)

「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盡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是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因爲他受青年受學者受社會的暗箭實在太多了，傷弓之鳥驚曲木，豈不是當然的事情嗎？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是皮下一層，在那裏潮湧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這一種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兩地書』裏面，看得出來。我在前面說周作人比他冷靜，這話由不十分深知魯迅和周作人的人看來，或者要起疑問；但實際上魯迅卻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只是勉強壓住，不使透露出來而已。」(下略)」

現在我之所以把這些文章節錄在下面，因為：我有一種習慣，每想到了魯迅，則在我的記憶裏所殘留着的若干魯迅的文章，就正好好像從魯迅自己的口讀着，而我親身聽着一般地，常常在清楚的感覺下回憶起來。這種習慣便誘惑着我把其中的幾則介紹在這裏，因為這是對於讀者的比較適當的啓示。可惜我的譯筆拙劣，一經改譯，所謂「寸鐵殺人，一刀見血」的文氣忙都要消散而不見了。

我不過是一個影，要別你而沈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沈沒。（一九二四年九月）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職業……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價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一九二六年三月）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

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一九二六年四月）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一九二七年九月）

生子此時此地，真如處荊棘中，國人竟有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憤歎。時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舊鄉，仍不能絕裾徑去，野人懷土，小草戀山，亦可哀也。日本爲舊游之地，水木明瑟，誠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其嚮往，去年頗欲赴德國，亦僅藏於心。今則金價大增，且將三倍，我又有眷屬在滬，并一嬰兒，相依爲命，離則兩傷，故且深自韜晦，冀延餘年，倘舉朝文武，仍不相容，會當相借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盛意甚感，但今尙無恙，請釋遠念，并善自珍攝爲幸。（一九三〇年二月覆李乘中函）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一九三三年二月）

魯迅是大文豪。要記下來的文章是很多。把它一一地抄下，那是沒有止境的。上面是從小說以外的文章裏，自然地記憶得到的中間隨意的選擇了出來，這是比較地可以不加說明便很容易理解的東西，因爲是這樣的理由，且因爲我個人的愛好，所以在選擇或編列上也許是不很適當的。

但要是這樣，那麼我希望能够寬恕罷。總之，僅僅從這些文章，也可以想像得到魯迅是怎樣地絕望，怎樣地憤怒，怎樣地不屈，和怎樣地憂愁的罷！

魯迅所以不得不如此，乃是因為他渴望着新中國的誕生，而阻撓這希望的直接的東西，便是在長久的歷史過程裏腐蝕着中國的肉體的桿狀細菌，因此魯迅戰鬥的對手，便無非是這些桿狀細菌。要是普通的醫生，診治起來只覺茫然不知所爲，或者祇予以形式的地治療，但在魯迅，則傾了整個身體和全副精神來收拾這種病患。這病患是什麼呢？要是我們來解釋魯迅所醫治的東西，則它便是孔教，和對於孔教的中國民衆的首從，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中國民心的遲鈍。而且這遲鈍卻早已到達了腐爛的地步。魯迅的解剖刀雖然銳利，但這個腐敗，卻已通過了各個部分而直達骨髓。這樣的大手術，對於魯迅，當然是有着深刻的削骨之苦。而且魯迅他們，曾經等待着共和革命，並不能使中國本身改善，反且更弄得惡化了起來。

綜上所述，我把魯迅和孫文並列地說着，這使我擔憂是不是要曲解已故的魯迅呢。但這恐怕是我的杞憂罷了。罪不在孫文，我想魯迅決沒有不佩服他偉業的理由。那一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句話，即使算是有關外形的政治而說的，而由於孫文的首倡，卻已成爲歷來執政者的標語。實際上，孫文的政治革命也是尙未成功的。

每次想到了魯迅，和很清晰的回憶起他的若干文章的同時，他的風貌也彷彿浮現在我的眼前。

那毫無做作地矗立的，濃濃的，豐富的，平頂的頭髮，像用秃筆塗出來的粗大的眉毛，那令人想不到不屈不撓的很大的鼻孔，和從鼻翼兩側急角度向下傾斜的八字式的深深的皺紋，那在中國人中比較濃密的，不修理的日本人風味的鬍鬚，從這鬍鬚下面看到的，那似乎表示古怪脾氣的嘴

唇，和旁人不同的，彙集着他獨特的性格的特異的兩眼——它和面孔的其他部分比較起來，是略微小了些，稍稍垂下，像含着露水一般地溫柔，同時目光炯炯地像鷹隼一般地嚴視着一切，在眼瞳那裏彎曲的線條，又是毫不假借地表現了他的潔癖。這不單是眼瞳，他的稍稍浮腫的方形面孔的輪廓，也多少造成了他異乎常人的風貌。在這浮腫樣子的地方，漂着一抹憂鬱的感覺，那輪廓的線條的模糊的地方，有着茫然不可捕捉的感覺。總括地說，他有銳敏也有慈愛，有雄壯也有悲憫，是具有一種東方的悠揚之感的深邃而美麗的風貌。這樣的臉面——使我想到了他的文章；每次想到了他的臉面，總覺得他的文章和臉面之間沒有絲毫的差別。總之，我想到了他的文章便連想到他的面孔，想到了他的面孔便又連想到他的文章。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瞻仰他生時的儀貌。在我頭腦裏浮現的祇是他將近晚年的一幀照片。

我到魯迅家裏去拜訪，已是魯迅去世的幾個月以後，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在上海法租界霞飛坊六十四號的家裏早已沒有魯迅的影子，那很像魯迅面影的九歲的遺兒海嬰君，抱在魯迅夫人廣平女士的手裏，異常地愛護着。

在這狹長的應接室的壁上，奧村博士氏畫着魯迅的面像，那面像上隱藏着苦鬥的痕跡，在最後的病榻上安眠着。對面的壁角，有玻璃的罩子，那冷冷的玻璃罩裏面，有奧田齒科醫生手製的死後的面型，在傍晚的黝暗裏浮現着白色。

在死牀的畫像的旁邊，懸掛着一張魯迅親筆寫的七言絕句的有色紙張。那上面這樣寫着：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

一九三三年民權保障大同盟的中心份子之一楊杏佛氏被刺，在盛傳魯迅自己的危難也已迫近

的時候，魯迅卻還是參與了楊氏的葬儀，回來便作成這樣的七絕。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的。在他逝世一年的一九三六年以前，以及第二年的一九三七年以後，在中國的歷史上正可以判然地劃分開來。這就是中日事變的前後。要是魯迅活着而遭遇到這樣的事變，將抱有怎樣的感想呢，這是不能輕易地判斷的。……

實際上，雖說由於孫文的這種破天荒事業的完成，而在長久的歷史裏被崇敬着，但他的這種主義和主張，將與時間一同地會被修改了的罷，他的那種改革了的政治形態，也難保沒有再度被改革的一天。然而魯迅為國家，社會和民族而用血來寫作的熱誠的文字，卻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使在燈下讀着他著作的年青人的胸脯溫暖，而有多感的熱血湧上來的罷！

第一章 幼年及少年時代

魯迅原名周樹人，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八月三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城內的東昌坊口。世代書香。當時祖父在北京做了翰林學士，父親也是相當有地位的讀書人。當魯迅誕生的時候，由北京的祖父命名為樟壽，字豫山，但後來因為他的字號豫山和「雨傘」的發音相近，所以又請求祖父改名為豫才，及長，到南京去投考學校的時候，纔開始改名為樹人。

說到紹興，因為它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越國的首都，而且又是紹興酒（老酒）的產地，所以知道這地名的人一定不會少罷。筆者十餘年前在杭州居住的時候，會到那裏遊歷，現在卻不能清晰地記憶，但那不愧為酒之產地的市街外面流過的河水，就我有限的經驗判斷，在中國河流中特別清冽地，流動着青色的澄清的水流，直至回國以後想來，也還能回到它的悅目。那裏的人口大約有十萬，街上溝渠縱橫，是古風的寧靜的城市。郊外不遠的地方，在廣漠的田野裏遮斷視線的，是會稽山兀然孤立着，形態異常險峭。

魯迅的父親，對於孩子們似乎是相當冷淡的人，但祖父卻深深地熱愛着孫子們，魯迅便深受他祖父的影響，後來在性格上也似乎受到了影響。對於這位祖父的事情因此有稍稍詳述的必要，可是遺憾的是，連最簡單的軼事也不得而知。魯迅四歲以後有弟弟周作人，再四歲以後有周建人。周作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深通中外文學的學者，同時也是隨筆的大家，周建人則在日本比較地生疏，他是在生物學等方面有着不少著作的人。

魯迅在六歲的一年進入私塾讀書，於是他可以去看看那幼少年時代嗜好的社戲，以及描畫繪畫

等等。關於這種社戲和繪畫，在他自己的寫作中常常提到，而關於繪畫，則有周作人的詳細談到的有趣的文章：

「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繡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一八九三）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疇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繡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回窗了。回家以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宮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狂，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卻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欣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下略）」

（魯迅傳）

至於鄉村的社戲，每年夏天跟母親歸寧而到平橋村的母親的故鄉時，總出去看看在附近趙莊做的社戲。在貫穿豆麥田間的河裏，搭乘着篷船航行了五里的光景，那種往返途中的快樂，要比起社戲似乎更不容易忘記，後來題名「社戲」的短篇小說，便是產生於他對當時的回憶。在作品裏所描寫的上趙莊去的路上，從夜晚以後，便遇不到大人，只是大眾的孩子們，在船裏的比較大一些的孩子們划着船。月亮的光在水蒸氣裏朦朧的，淡黑的羣山看來好像跳起來的野獸的背

音，遠遠地像是閃爍着漁火，而突然間卻又聽到了婉轉悠揚的吹笛的聲音。

戲臺建搭在趙莊村頭的河邊空地上，他們在遠遠的地方停了船，依舊坐在船裏，模模糊糊地眺望着戲臺。臺上有黑的長鬍子的武將背上插着四張旗，捏着長槍，和一群赤膊的人正在打筋斗豎蜻蜓。當小旦出來咿咿呀呀地高聲唱了一陣以後，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鬍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然而老旦卻終於出臺了。這之間，他們都覺得累了起來，便踏上了歸途。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的時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得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不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蹿，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魯迅美妙地描寫着歸途的情景。不久划船的孩子疲乏了，肚子也飢餓了，於是大家走到岸上，到豆田裏去偷取羅漢豆，在船裏很快地生起火來，把它煮熟了喫。歸家已過十二時，他的母親獨個人站立在橋上等待着回來。

又和魯迅的幼少年時候有着關係，而後來被魯迅懷念着的人有兩個：這就是魯迅家裏的女傭長媽媽和幫傭的兒子閏土。長媽媽是魯迅的保姆，是肌膚黃色，肩背很堅實的矮矮的女人。「長」並不是中國人的姓，爲什麼這樣的稱呼卻不很知道，只是大家這樣地叫，自己也這樣地叫着就是

了，但據那女傭自己向魯迅的解釋，是因為在她來這裏以前雇用的女傭，身材非常的高，所以人們都叫她爲「長媽媽」，那女傭去了以後，代替的雖然是矮短的她，可是仍舊把以前叫慣了的名字加在她底頭上了。這女傭是不識字的，然而卻又好像是素朴的可愛的女人。魯迅和這長媽媽睡在同一隻牀上，聽着各式各種的中國的俗例，傳說和故事之類。她是多話的女人，一面切切察察低聲絮說着，一面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的鼻尖。而且一到了夏天，她躺在牀中，成爲「大」字的樣子，把魯迅擠壓在一角，連身子也不能够動彈，搖她又不動，喚她又不醒，一種悶熱和局促使魯迅異常惱恨。

當魯迅睡覺的時候，她老是教導着：不應該走到死了人和生了孩子的人家去，要是喫飯落掉飯粒，那非檢起來不可，曬着椅子的竹竿下萬不可鑽過去，又在大除夕的夜裏，她更教導着：

「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

有時講到長毛的事情。她說：「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因此魯迅就說：「那麼，你是不要緊的。」於是她嚴肅地說：「那裏的話？！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椅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魯 迅 傳）

有一個時候，魯迅從旁人那裏聽到關於繪圖「山海經」的故事，在這裏面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魯迅聽到了以後，就日夜地想着要這東西來看，心想問問長媽媽：「山海經」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可是自己知道，即使說了也是沒有用的，但終究還是這樣地問了，這以後，她抽空回家四五日，回來的時候，她說：「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於是她拿出了四冊疊得很齊的「山海經」。這

便是魯迅最初得到手裏的最最心愛的書。

魯迅在追懷她的文章的最後，改變了他的幽默的作風，而寫着：「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

閩土則是居住在鄉下的海邊，常到魯迅家裏來的鄉下人家的孩子，他把糞撒在雪地上，上面用短棒撐着一隻竹匾，等小鳥喫糞的時候，把縛在棒上的繩子在遠處一拉，竹匾便蓋住了小鳥，他是把這樣的捉捕小鳥的方法，或者把在海灘邊拾着貝殼的快樂，或者把月夜的西瓜田裏的祕密等等，教給魯迅的最初的一個人。

在魯迅的幼少年時代，既沒有專給孩子看的畫本或童話一類的書，也沒有什麼遊戲或運動之類，在私塾裏念書，只是囫圇吞棗地一味的死背，因此他對於閩土的自然而活潑的生活，是多麼的羨慕啊，這是可想而知的，他也許只能常常在夢裏看着社戲或摹寫插畫了。

當他十三歲一年的春天，祖父介孚公從北平回來，但同年秋，因為公事的關係（不知是爲了什麼事件），下獄於杭州的監獄，而父親伯宜公又生重病，一時全家陷於極度的不幸之中。

在此以前，家裏還有四五十畝的水田，生活不至於困難，但到了這時，財產傾落，家裏的人也分居各處。魯迅和周作人便都寄居在紹興城外皇甫莊的母親的伯父家裏，但隨後不久，留下了周作人，獨自地回到了自己的家裏。

父親繼續了三年的病。

這期間，他幾乎每天在典當和藥店之間往來。藥店的櫃臺和他身體一樣高，典當的櫃臺，卻高於他的身體一倍。他便在高高的櫃臺上仰着頭把典當的衣服或首飾拿上去，再用這當來的錢，立刻走到藥店去，在和身子一樣高的櫃臺上買藥。可是，這樣地回到家裏以後，卻又須忙別的事

情。那醫生處方的藥引，奇怪到了極點，例如：經霜三年的甘蔗，原對的蟋蟀，結子的平地木之類，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魯迅爲了這些東西卻不得不終日在外面來回地奔走着。

醫生每隔一天來診治，因爲在當時也要一元四角錢的出診費，所以在已經貧困的他的家裏，籌劃這筆醫費是相當的困難。這醫生約繼續醫治了兩年，魯迅便和他漸漸地相熟，最後成爲很好的朋友，但兩年以後的一天，他推薦了另一個叫做陳蓮河的醫生，他說：「病是不緊要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的快。」說着他回去了。這醫生便從此不再來看他的父親。

因此，終於不得不改請陳蓮河先生來。這醫生的診費也是一元四角。他不同於以前的醫生的地方，是在說出非常難買的藥引，所以魯迅的勞苦也倍增了。但結局卻什麼效果也都沒有。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一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爲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他的父親仔細地考慮一下，但不久搖了搖頭。

有一天，陳蓮河先生又說了：「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他的父親又沈思了一會，接着又搖了搖頭。

這樣的醫生的辦法使魯迅非常惱恨，後來他用憤怒的口吻寫了下面的話：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扁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但是S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

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輪在牀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卻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當時，他已用懷疑的目光看這種奇怪的醫術，這和他幼年看見的「二十四孝圖」的繪本時，對於「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的二幅繪畫所表現的孝的觀念的不合理有些不同，他甚至已經抱有一種反感了。

像這種不合理到極頂的古訓以及毫無信用的醫術，被他看在眼底，和他後來所走的路向有着極大的關係。後來，他注視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他知道這裏萌芽着西洋的醫學，而開始對於西洋醫學給予極大的關心，這當然是由於他的中醫使他苦惱的經驗所給予的力量。他想，從這些中醫的詐僞（他已經知道得非常明白）中，把無數的病人及其家族拯救出來，這對於國家將是一件急切而重大的工作罷。

父親在他的看護下終歸無效，到三十七歲時（那時他祇十六歲）便逝世了。

在這裏可以附帶地略說他的弟弟周作人，他從最初和魯迅一同寄居的人家出來，曾經一度移居到別處，在父親死了的第二年，正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便寄居到杭州花牌樓的宋姨太太（祖父的妾）的家裏，在這裏讀書之外，每隔一两天到監獄去看他的祖父，但在這裏，他又和同年同月

生的親戚的少女有過一度淡淡的，而卻是終身不會忘記的快樂的初戀。

可是魯迅在十八歲那年的春天，進了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水師學堂是海軍的學校，也許是因爲無需學費所以才到那裏去讀，但也許是因爲當時的由於西洋科學而產生的富國強兵主義的影響。圍繞於這時前後的他的環境，簡單地說來，則中國在中日之戰的慘敗，正當他前一年的十七歲時候；由於義和團事件而北京被八國聯軍蹂躪的後二年，正當他二十歲的時候。同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容納了廣東南海的學者康有爲之說，要把西太后幽禁，正決定祕密地實行政治大改革，然而事機洩漏，被太后知悉，便把光緒幽禁於禁苑內南海的瀛臺，這次戊戌政變的悲劇，正當他前往南京的一年。隨後旅順，大連，威海衛，膠州灣，廣州灣等被俄，英，德，法各國租借，把這樣狀態的中國的危急設法挽救的滿洲朝廷的皇帝奮起的時候，孫文已奔走於美，英，日諸國之間，向同胞開始作「推翻滿清，建立中華」的宣傳，而政治綱領「三民主義」也在這時候完成。是這樣的狀態。然而在中國，早從一八六〇年起，已眼見李鴻章等所主張的「洋務」運動（研究西洋科學的運動）正著著進行，因此在當時較有銳氣的青年，誰都抱着像他那樣的志願的。

然而當時科舉制度還沒有廢棄，社會人士以爲不通科舉而學習洋學，那是把靈魂出賣給洋鬼子，所以不斷地排斥着，因此他的志願，也是一般社會所不能夠接受。當然他的母親是竭力希望他終止的。但他卻下了堅強的決心，去探求和過去不同的另一種的嶄新的人生。

於是他的母親哭泣着，籌劃了八塊錢遞到他的手裏。他把這筆款子作爲路費，踏上了開拓新人生的到南京去的旅途。這是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閏三月的故事。

第二章 日本留學

魯迅進入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的第二年，便從這裏轉學到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在這礦路學堂裏讀了兩年的書，到二十一歲的時候畢業了。要敘述這期間他的生活，則資料方面我們甚感不夠。只是在這裏他開始知道世界上還有物理，數學，地理，歷史，圖畫，體操等等的學科。眼看到木版印刷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那樣的東西，才恍然知道中醫的學說和處方，完全是有意無意的騙子。而這時候，也知道日本的維新是發端於西洋的醫學、

在這一時期，他主要地熱中於科學，此外，用中文翻譯過來的西洋新思想的書和小說之類，也是常常購買來的。其中主要的尤其是嚴幾道和林琴南的譯書，前者之中如「天演論」(托瑪斯·赫胥黎的「進化和倫理」)，「法意」(孟德斯鳩的「法之精神」)等等，後者之中如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以及科南道爾的作品等，他每次出去，都買了來讀。對於古書之類則不很注意。只是歡喜寫些文章，常常寫着應時的隨筆和詩文。十九歲時「憂劍生雜記」中的一則是這樣寫着：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則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則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在這樣易感的年青人的心裏，那光緒皇帝的戊戌政變，那八國聯軍蹂躪北京的事件，那國內開始湧湧着的革命的風潮，所有這些都會給與他以很深的刺激罷，這是不難想像的。

但他在礦路學堂畢業以後的第二年，即在二十二歲的時候，他由江南督練公所派遣到日本去留學，進了東京的弘文學院。這裏主要的教授着日本語，是中國留學生的一種預備學校，可以說是現在的東亞學校的前身。

從這時候起，他在學業的餘暇時候，漸漸地更接近了哲學和文藝的書，尤其是開始注意到人性和國民性的問題。

到日本兩年以後，他進了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於是更接近於實現其舊日懷抱着的西洋醫學救國的素志了。到仙臺去讀書，似乎是不滿意於東京留學生界的浮薄氛圍氣。

在仙臺醫專的全校祇有他一個人是中國留學生，當然，學生之中有親近他的，也有不少是輕蔑他的，總之，他的生活可說是孤獨而寂寞。但在這裏，有一位使他終生不能忘懷的先生，這就是他遇到了藤野嚴九郎教授。

藤野教授是擔任教解剖學的。他在黑而瘦的臉上留着八字鬚髭，戴着近視眼鏡，說話時抑揚頓挫地慢慢的說着，老是草率地穿着凌亂的洋裝，甚至常常連領帶也忘記了扣。有一天，這位教授叫他自己研究室去，請他把筆記本拿來看看。他去拿了筆記本來，教授要他留着，二三天以後，在交還筆記本時，要他每隔一星期拿去校閱。他打開了筆記一看，只見它從頭至尾滿塗了朱筆。他不單把錯誤的改正，脫落的添加，並且還逐一訂正文法的錯誤。這以後，筆記本的訂正更繼續着。到了學期的終了，他在同級一百四十二名的同學中，考了第六十八名，成績及格了。這裏有當時的成績表。爲了參考，且抄錄在下面：

解剖

五九·三

組織

七二·七

| | |
|----|------|
| 生理 | 六三・三 |
| 倫理 | 八三 |
| 德語 | 六〇 |
| 物理 | 六〇 |
| 化學 | 六〇 |
| 平均 | 六五・五 |

到了第二學年，藤野教授擔任了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但在解剖實習的開始以後經過一星期的光景，教授叫了魯迅來，照例用抑揚的聲調說：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教授於是又問他所謂中國婦女的裹腳到底是怎麼樣樣子呢？那是肯將怎樣地變得畸形呢？他終於歎息着說了：「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同級的學生會幹事到他的宿舍來要看他的筆記本。他把筆記本交給同來的人亂翻了一陣，後來馬上回去了。他們回去以後不久，他接到了一封匿名的信。拆開一看，最初一句這樣寫着：「你改悔罷！」底下這麼寫着：「上學期解剖學的試驗題目，藤野先生曾在筆記本上做了記號使你知道，所以你底成績是及格了。」

他立刻把這件事情告訴給藤野教授，同時，和他親近的幾位同學也覺非常的憤懣，和他一起到幹事會去責問他們檢查筆記本的無理，更要求他們發表檢查後的結果，因此謠言便立刻消滅，但他知道，自己的被人目為低能兒，那是因為中國是弱國的原故，因此他更爲了祖國而不得不激

起悲憤的感情。

在第二學年裏有微菌學的科目，那細菌的形狀都用電影來說明，但當課業告一段落的時候，多餘的時間便常開映時事電影，因為剛巧是在日俄戰爭以後，所以時事電影也自然都有關於這方面的了。戰爭的場面當然是日本軍隊勝利的場面，學生們看着一個一個地拍手歡呼。有一天，在開映的期間，他混在學生們的羣裏暗暗地看着電影。於是在電影的畫面上，他突然發現了一個中國同胞的姿態。這同胞被日本兵牽到槍斃的場上。他做了俄國的間諜，所以給捕捉了來。可是此外也出現了多數的同胞。他們是看槍斃的人。那被槍斃的人和看槍斃的人都是強壯的體格。槍斃在魯迅的眼前執行。學生們又拍手歡呼了。可是他獨個人卻感到無限的苦痛。這不是爲了同胞的被槍斃，而是爲了那些有着強壯的體格而去做示衆的材料和看客，這種麻木的神情卻實在令人可悲！

而從這時候起，他底學習醫學的志願便很快地被別的東西代替了。他深深地感到：祖國的同胞即使用新的醫學使他們的身體強壯，使他們的壽命延長，如果他們的精神依舊像今天一樣，那麼中國還是和過去的中國沒有什麼兩樣。他們需要他們底精神的革新！他以為這才是今天最大的急務。然而怎樣才能改革這種精神呢？他的結論是：除了用文學的力量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這事情他不僅用頭腦，還用了他全身的全部精神來思考。八年前在鄉人的白眼裏毅然地踏上開拓新人生旅途時的他，還多半帶着少年的夢幻，如今，在他內心膨脹着的東西，才是從夢幻裏醒來的，用冷澈的眼睛透視現實而起的灼熱的情感。那本來燃燒着祖國的民生思想的心，只是青春的熱血被煽動，而現在，卻已經動搖了起來。他於是決意要去東京展開文學運動了。

不久結束了第二學年。他離開仙臺時去拜訪藤野教授告別。教授在臉面上顯露了悲戚的表

情，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魯迅因為眼見先生淒然的臉面，便這樣地撒了個謊。可是教授卻歎息着說了：「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在魯迅離開仙臺的幾天前，教授請魯迅到他自己的家裏，給了他一幀相片。相片上寫了「惜別」兩個字，並且同時也要求魯迅送給他一幀。但因為他沒有相片，所以約定以後再送給他。

然而，非但這預約一直到最後沒有實行，並且連一封書信也沒有給他。不過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魯迅已完成了預約以上的事情。這就是他後來寫了「藤野先生」一文，當昭和十年，岩波文庫版的「魯迅選集」編印的時候，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兩人與魯迅商量選擇作品的篇名時，魯迅回答，無論如何「藤野先生」一文是必須收入的，準此以觀，很可以看出他正默默地祈禱着這一篇文章能映入藤野教授的眼裏。而這樣的目的，是被達到了。但這件事在魯迅是不知道的。還在雜誌「文學案内」裏發表介紹而終於為一般人所知道，已經是魯迅死後第二年即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事情了。

寫到這裏，且敘述一些關於藤野教授的事情。藤野教授生於明治七年福井縣坂井郡的本藏村下番，在愛知縣立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便執教母校，明治三十四年末，轉任教授於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在這裏工作直至大正四年的春季，此後返歸鄉里，在三國町開設醫院。因為大正八年在母親的娘家也是從事醫業的胞兄亡故，而且又因為大兒子正在求學，所以又在母親的娘家分設診所，一直到昭和八年。當時，因為亡兄的遺兒也已經在本郡的蘆原溫泉開業，已有相當鞏固的基礎，所以把那自己的生家作為亡兄遺兒的出診所，自己便終止了在生家的診療。就在這前後，各

鄉村都發起歡迎他去的運動，但他畢竟不願離開生地，租借了寺小屋時代的老師的舊宅前面鄰舍的一部份作爲診療所，每天從位在別處的住宅搭乘電車到那裏去辦公診療。病患的人當然都是農民，他對於病患者的態度非常周到和親切，他以年老的身軀整個地獻給鄉村的農民，而他也獲得了鄉村農民的深深的敬慕和信賴。

關於上述的他底消息，是由於該地的三個新聞記者（坪田和雄，川崎義盛，牧野久信）看見「日本評論」雜誌上的增田涉的「魯迅追憶記」，而才知道藤野野教授和魯迅的關係，於是他們試探這是不是他們知道的藤野醫師的事情呢？最後果然證明了這是事實，因此由三人執筆寫了「藤野醫師訪問記」，發表在「文學案內」雜誌上，這才開始被一般人普遍地知道了。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魯迅這樣地寫着：

「在我所認爲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候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

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真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下略）」

魯迅燃燒着文學運動的熱忱而前往東京去。在這裏必須附加地說明，他底要寫文章的志願，

決不是看着那電影的時候突如其來的，而是在未入醫專的前年，即當他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已經在同鄉的留學生們合辦的「浙江潮」上發表了一篇「斯巴達之魂」，燃燒着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心的，總之，傾向文學的心的萌芽，很早便已產生了。然而魯迅在這樣的熱望下來到了東京，卻遭到東京的友人們的冷淡。佔有了當時中國新青年的心坎的，乃是實際的學問，所以大家都學習着法政和理工等等，對於文學，都以為是不適時宜的無用的廢物，當然是被輕蔑着的。因此，志向於文學的魯迅，便得不到他們的好感。而且他們毫無根據地謠言看見他和日本女人結婚而帶着孩子在神田一帶散步。這謠言一直到了故鄉，從故鄉便像箭一般地寄來了催促他回國的信。這樣，他不得已地回到故鄉，在這裏由於親戚和家屬的逼迫使他和山陰的朱女士結婚，但在第一個星期裏，他便留下了新娘，和其時畢業於江南水師學堂而到日本去的弟弟作人再一同到東京去。不用說，這次婚姻是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習慣，對於他是毫無幸福可言的，他的所以依從，第一是出於要使母親安心的孝心，第二，也許是因為革新結婚制度的時代的新氣象還沒有成熟。

他這樣地再回到東京以後，在對他周圍的冷淡空氣中，他畢竟獲得了若干同志，並且計劃出版雜誌，刊名定為「新生」。計劃一步步地進行，因為大半都是意志不堅定的人，所以漸漸迫近出版的時候都溜走了，到最後只剩下貧窮的三個人。由於這些原因，「新生」在沒有誕生以前便已經潰滅了。

當然，魯迅感到異常的失望。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第二年，他爲了雜誌「河南」，而辛勤地寫了「一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幾篇的文章，聊慰他的鬱悶。那以介紹進化論的「一人之歷史」起，都是啓蒙式的論文，特別是「摩羅詩力說」，是讚美拜倫，普式庚，萊芒托夫，但丁，易卜生，彼得斐等革命詩人的力作，當然，因爲是文學革

命未起來以前的事情，所以完全是用古文體裁寫作的，例如：「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音，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歎，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節自「摩羅詩力賦」）但僅僅看到這樣的例子，不是已經就可以看見魯迅為祖國而熱血沸騰着的麼？另一方面，爲了要繼續學習在醫專時學習過的德文，他便做了德語教會學校的聽講生，更和若干友人一起地，向某一個亡命在日本的俄國女人學習俄文，但他卻因爲經濟的關係而並沒有繼續得長久。

這時候正是一九〇七年，先是一九〇五年正有着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革命團體興華會（湖南的黃興主持），光復會（浙江的章炳麟主持）以及興中會（廣東的孫文主持），乘孫文在三年中遊說世界各地終了再回到了東京的機會，大同團結，組織了中國同盟會，孫文被推爲總理，又在一九〇六年，光復會的領袖章炳麟在上海出獄而到了東京，在民報從事筆戰，東京便成爲革命運動的策源地。一方面，這一年在中國的國內，爲了緩和民心，發詔準備施行施憲政，但反對的革命的火燄更加熾盛。同年，同盟會會員在萍鄉，醴陵開始準備舉義，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的兩年間，計有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等起事竟達六次，更有以汪兆銘謀刺攝政醇親王爲始，狙擊政府大官等事件相繼疊出，革命的風潮已燃起了燎原之火，因此也當然地燃燒了魯迅的年青的熱血。

然而魯迅堅定主意，無論如何要從文學來改革中國的人性，因此一九〇八年和幾個朋友一同到章炳麟那裏，在開始聽講「說文解字」的講義時，他也並不加入爲光復會的會員。而這一年，他又和在校政大學預科念書的弟弟作人共同從事了外國小說的翻譯。

這時候他周圍的環境，可以從他後來寫的一篇文章裏看出來。根據這篇文章，他在東京得到

了他同鄉的革命志士徐錫麟、爲刺殺安徽省的巡撫恩銘而被捕、而挖出心臟煮了給恩銘的衛兵喫的消息，一般留學生異常地激昂，魯迅等便照例召開同鄉會，哀弔烈士，痛罵清廷。然後有人主張向北京通電，詰責政府的無道。這裏大會的出席者顯然分爲讚成和反對的兩派。魯迅便陳述讚成通電的意思。於是從會場的一角突然起了一種粗俗的聲音：「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魯迅喫了一驚，朝這聲音的方向看去，只見他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這裏，魯迅偷偷地試問旁邊的人，才知道他是名叫范愛農，而且是徐錫麟的學生。因此更使魯迅無從了解他的居心，然而結局，因爲主張打電報的人佔多數，他也屈服了，但當推選電文起草者的時候，他卻又嘮叨了起來：「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去做囉……。」

到後來魯迅才明白：原來一羣同鄉們都對於魯迅有着反感，卽如范愛農那樣的態度，只不過是代表他們的厭惡魯迅者。上面所說的，魯迅和日本女人結婚，且帶領孩子在神田散步等等的流言，實在是由於他們厭恨魯迅的原故。魯迅被厭恨，基本的原因，只是因爲在魯迅內心所厭恨的舊中國式的形式主義和懶惰，在他們的身上還多半存在着，因而對於魯迅的直爽的性格的反感，也有意無意地不禁流露在表而上了。

魯迅和周作人共同著手的翻譯，在第二年卽一九〇九年便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二卷。當然是因爲古文的原故，第一冊印千部，第二冊只印五百部，印刷費是友人蔣鴻林幫助的。翻譯的作品之中，計英美一人一篇，法二人六篇，丹麥一人一篇，俄五人十八篇，波蘭一人四篇，波希尼亞一人二篇，新希臘一人三篇，芬蘭一人一篇，合計共三十七篇。（實際上，這中間魯迅翻譯

的，是從德文重譯的安德列夫二篇和伽爾洵一篇共三篇。）

把翻譯的作品一看，便知道他們的選譯是以斯拉夫系統，被壓迫民族的作品作為中心。於此又很容易地看出：介紹這些外國作品的主要用意，是要助長讀者對壓迫的反抗心，而促成其民族的自覺。這不單僅僅是工作的目的，魯迅自身的讀書，也多半偏於這樣的傾向。這從魯迅的志向文學的動機看來，那是當然的。

當時的魯迅和周作人二人的讀書傾向，因為在周作人的文章裏說得很明白，所以且引用其較長的一節罷：

「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來夫 (Leonid Andrejev)，我所能懂而喜歡者只有短篇『齒痛』(Ben Tobit)，『七個絞死的人』與『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懺悔』二書耳。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甚發達，比較的介紹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蒐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著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瑞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義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買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蒲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爾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託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賬起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

於肺病，於今卻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麼 Aus Fremden 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評荷蘭凡爾寧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道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耳孟託夫（M. Le. Rimontov）的『當代英雄』，契訶夫（A. Tchekhov）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V. Korolenko），後來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里（N. Gogol），『死靈魂』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又『得勝的巴耳得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里和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此蓋為不懂幽默而亂罵亂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中略）捷克有納盧陀（Neruda），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金佛林多（Päiv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牙利則有詩人裴象飛（Petöfi Sandor），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表彰擺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象飛為之繼，甚致贊美。」（下略）

另一方面，魯迅不很關心日本的文學，他並不去留意風靡於當時日本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燃燒着新興的革新的希望的他（不僅是他，周作人以及另一些人們也都是這樣），都並不注意日

本式的變態的作品或者法蘭西的本來的作品，對於那些缺乏了未來積極性和能動性的自然主義文學，他們沒有關心的餘裕。他們固然讀着鷗外，敏，二葉亭等的作品，但也側重在批評和翻譯的方面，只是漱石的作品被摯愛着，這並不是對於漱石的精神或人生觀起了共鳴，而是愛好他的諧謔的輕妙的筆緻。

可是，「域外小說集」出版以後的結果是怎樣的呢？第一冊在二月出版，第二冊在六月出版，代理經售處是東京和上海，但在東京，第一冊和第二冊總共不過賣掉二十部，即在上海也是差不多的程度。爲了這個原故，魯迅兄弟的原定陸續出版的計劃也沒有實行，僅僅出了這兩冊便中止了。

一方面，魯迅也得擔負起故鄉的家庭生計，再也不能在東京居住下去，所以「域外小說集」第二冊一出版，便只能留下了未竟的志願而依依地歸返祖國了。

第三章 鄉里生活

魯迅回國以後不久，便就任了杭州的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的生理和化學的教職。他頭上的辮子，居住在日本的當時便翦下來了，他把翦下的髮辮，一半送給住宿舍的女傭人作爲假髮，一半在理髮處翦下的時候給丟掉了，因此就像一般的外國留學生那樣，當他歸國的途次，也在上海的專售假辮子的店裏，化了大洋二元買了假辮子裝着，以遮掩人家的眼目。但是當帽子不戴的時候那是多麼的危險，而且，不但自己常常擔心着在擁擠的人叢裏不要給人家擠下或是擠歪，人們也都用驚訝的眼注視着他的髮辮。後來覺得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便索性廢了假辮子，穿着西裝在街上走。然而這無辮子的反感是很大的。

走在街上，在他背後的笑罵聲湧起來了。其中也有人跟在他的背後罵：

「濟冒充鬼！」

「假洋鬼子！」

當他不穿西裝，改穿中裝的時候，他們的惡罵便更厲害了。因此，最後他毫無辦法，在手裏攜帶了一根手杖，把那些謾罵的人一個一個地敲打。於是漸漸地給鎮壓住了惡罵，只是走到沒有打過的生地方還是罵。

第二年的八月，他離開了杭州，轉任故鄉的紹興中學堂的教員兼學監。當時他正是三十歲。爲了要做中等學校的教員，接洽了很多的處所，但當然，他是不以做中學教員爲甘心的。然而對於他卻沒有什麼話可說的。在這樣偏僻的鄉間，文學運動是不可能的，是比起在東京的文學運動

更得不到反響，所以在這方面的計劃，也終究是斷念了。

在這樣的意義上，他是一個失意的人，他有着寂寞的心境。

而且無髮辮一事，有很多方面使他發生困難。那滿洲人的紹興府長官每次到學校裏來，在他的頭腦裏總是懷疑地，把眼睛骨碌骨碌地瞅着，而學生們中間，卻開始起了剪除髮辮的風潮。多數的學生要把辮子剪掉，魯迅感到相當狼狽，忙加制止。於是學生們推舉代表向他責問：「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呢？」他便回答：「沒有辮子的好，但我反對剪除。」自此以後，便一度失卻了過去的學生們對於他的信仰，他們都說他「言行不一致」而開始輕蔑他。而且有好幾個人，不管他反對竟然剪掉了辮子。他於是每天，像坐在冰窖子裏似的，像站在刑場的旁邊似的，深深地感到了憂鬱。

這時，他在一個朋友的客廳裏，出於意料之外地遇到了范愛農。他們相互地看着，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大家高聲地笑起來了。相互地對於嘲笑自己的對方苦笑了起來。他跟以前並沒有兩樣，翻着白眼，高大的身體，在頭上有幾處長着很多的白頭髮。他穿了舊式的布馬褂，破碎的布鞋，外表上看來，很有凋零的模樣。根據他自己向魯迅說，他後來沒有學費，不得已回到故鄉，但在故鄉他遭受到輕蔑，排斥和迫害，幾乎無地可容，如今躲在鄉下，教着幾個小學生暫時糊口。只是納悶的時候，也常到城裏來遊玩。他說現在，酒是他最最愛好的東西。

在這裏他們便一同喝着酒。兩人立刻變得親密了起來。自此以後，他每次到城裏來總是訪問着魯迅。他們每次見面，老是喝酒，喝醉了以後，便胡亂地談着，惟有這樣才驅除了心頭的鬱

積。

有一次，魯迅回想起早已忘記了的事情去問他：

「在同鄉會的時候，你爲什麼特別地要反對我呢？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哪？」

「啊，那事情嗎！你還不知道嗎？這並不是我特別和你過不去，這不單是我，我們都是這樣的呢！」

「噢，可是在那以前，你早知道我是誰嗎？」

「怎麼不知道！在我們到達橫濱的時候，你不是出來迎接的嗎？你不是瞧不起我們，搖了搖頭？這便是使我們憤怒的地方！」

至此，魯迅便回到幾年前帶着朋友到橫濱去迎接新來留學的同鄉那時的情景。新來留學的有十多個人，他們在稅關被檢查行李的時候，突然給發現了一雙繡花的弓鞋，檢查員便奇怪地取在手裏仔細地看，而這時他想也許是搖了搖頭。此後大家搭乘火車，他們便開始很快地讓開了座位，甲要乙坐乙要甲坐地說着，突然車身「卡吞」地一搖，三四個人便一同重疊地倒了下來，這時候他想也許是搖了搖頭。因此魯迅又問了：

「我搖頭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稅關檢查的時候呀。」

「啊，是的，我對於你們帶來了那樣的女人鞋子實在不明白，那是誰的鞋子呢？」

「這還不是徐錫麟先生的太太底嗎！」

「到東京來，不裝做大脚，而把這樣的東西帶來，又有什麼必要呢？」

「誰也不知道呀，去問那太太自己罷！」

這裏兩人又哈哈地毫無猜疑地笑起來了。

這期間，魯迅偶然地開始寫了一篇小說。這是以東鄰的富有者作為模特兒，寫着長毛（其實
是難民的誤聞）將要入城，這富有者便驚惶失措地和一位冬烘教師商議着迎接和投降，所以這篇
東西富有諷刺的色彩，但魯迅沒有把它收入著作裏，只是連題目也不加地寫了放着。二三年後，
周作人加了一個題目寄給「小說月報」，卻特別為該刊的編者所激賞，把它發表在刊物的卷首。

但范愛農依舊常常地來，每次見面，總是從貧苦的生活裏省下一些錢來喝酒，相互地高談闊
論着。後來武昌突然起義了。這事情最初是由於內閣發表了借外債把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對於
這種再度出讓權利於外國，在武昌起了猛烈的反對，尤其是在四川省，總督和人民之間起了大衝
突，甚至官兵也有幫助了暴徒的，於是在武昌的湖廣總督端方便馬上率領武漢的兵隊到四川去鎮
壓，革命黨趁此機會便起來了。而留在武昌的官軍的協領黎元洪氏，被推選為革命軍的都統。這
時正是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也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與此同時，各省的革命黨員不約而同地
相繼響應，轉瞬間竟達十一省，紹興也在這範圍以內。

范愛農一清早到魯迅的地方來，他用笑容可掬的臉面向魯迅說：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魯迅也正這麼想。兩人便意氣揚揚地上城裏去了。城上一眼望去，滿是白旗。現在，他們兩
人已經可以坦白地向公眾暴露他們的沒有辦子了。

但紹興僅僅是表面上的革命，本質上並沒有什麼改變。因為這裏的革命軍政府，是由幾個舊
鄉紳組織而成，什麼鐵路的股東做了行政司長，錢店掌櫃做了軍械司長，都是這樣的狀態。但還
軍政府並不長久，不久匪賊王金發從杭州率領兵隊進來。不過他也立刻被多聞漢和新進的革命黨

所包圍，且由他們奉他爲王都督。因此衙門裏的那些人物，以前都是穿着布衣來的，不上十天，卻大抵穿上整齊漂亮的皮袍子了。

魯迅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范愛農便在他的下面做了學監。他們都是很忙，連閒談的機會也沒有。愛農依舊穿着那件布袍子，但卻不常飲酒，在學監的職務以外還兼任了教授，實在勤勉得很。

有一天，魯迅的學生某君來訪問他，說道：「王金發他們的存在還是不行。我想我們可以發行一種報紙把他們監視。關於這，在發起人方面，想拜借一下先生的名字。」

魯迅答應了。發起人全部是三個。五天以後報紙出版了，把軍政府和政府裏的人們大罵而特罵。接着開始罵到都督的親戚，同鄉和姨太太等。

這樣的罵了十多天以後，消息傳到他的家裏來了。說是都督因爲他們詐取了他的錢，還要罵他，所以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他們了。

魯迅的母親擔憂起來，不許他出去。可是他卻坦然地出去。他自己接受人家的是學校的經費，這在都督也應該明白，上面的所謂「詐取」，無非是威嚇而已。結果，誰也不敢來暗殺，而他寫了需要經費的信以後，二百塊錢又送來了。

然而愛農卻給了他一個新的消息。這就是所謂「詐取」，並非學校的經費，而是送給報館的錢。因爲王金發在報上給連續謾罵了幾天以後，會差人到報館送來了五百塊錢。這裏少年們中間，對於這筆款子到底收了好呢還是不拿好呢，他們開了會議，結果決定收下。其次，是討論收下以後是否再去罵他還是停止謾罵呢，最後的決議：繼續攻擊，因爲接受了他的錢，他就成爲股東，要是股東不好，那當然是應該罵的。在魯迅他們並未與聞之間，居然有了這樣的事情。

魯迅到報館去問起，纔知道這完全是事實。當他對於接受馮子的事務透漏不滿意的口吻時，那做會計的人忽然用生氣的態度對他說：

「報館爲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在這裏，他不再跟他強辯了。革命派的初出茅廬者大抵都是這樣的一種無賴漢。這裏魯迅不禁感到革命的矛盾了。

這時候，震駭於武昌叛亂的清政府，立刻派遣了討伐軍隊，但因爲軍隊毫無鬥志而敗北，不得已便請下野於河南鄉里的北方軍界領袖袁世凱出馬，給與一切的權限，把清廷的命運委托在他底手裏。袁氏命馮國璋和段祺瑞討伐，不久即奪回了漢口和漢陽，但是不知爲了什麼原故，漢陽以上不許討伐，反而由漢口的英國總領事的調解，去和逃往南京的革命軍間成立了妥協。

在這樣的狀態下，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革命的臨時政府，推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國號改爲中華民國。魯迅的鄉黨先輩蔡元培氏就任了這新政府的教育部長，所以魯迅被他邀請，正當不堪牽入故鄉腐敗糾紛的漩渦時，他自然樂於應召而離開了故鄉。

如果以最初的南京去，以及結婚以後的再度前往東京算來，這一次，是他第三回的離開故鄉了。

第四章 北京·沈默

魯迅的第三次出發並不是光輝的一次。這是因為革命還沒有真正地成就。那作為清廷的代表而和革命派折衝的袁世凱氏，也似乎支持了革命派的立憲共和政體的主張，而逼迫清廷退位，但這不是爲了他對於革命的眞確的理解，乃是爲了他自己有着獲得掌握大權的機會的野心。在軍隊的實力上，他有粉散革命派的把握，可是他和革命派妥協，逼迫了清廷讓位。

因此宣統帝在二月十二日退位，清廷遂結束二百九十七年的歷史而宣告壽終正寢。退位的上諭一如下述：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遺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共決國體。兩月以來，尙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播古賢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窳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邦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這種勉強保持了清廷的體面，確有深刻的哀憐的滋味。

清帝退位以後三日，袁世凱便從孫文那裏讓得了大總統的職位。這好像預先有着默契，即袁氏如使清帝退位，則孫文便推薦他爲大總統。把軍閥的巨頭推薦爲立憲共和的新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這根本和革命的精神相反，這是革命的最大的失敗，但這也可以說，革命派因爲沒有真正的實力，所以只得和袁氏妥協下去，以進行各項工作。（後來孫文在「建國方略」裏，把革命進行的時期，分爲軍政期，訓政期，憲政期的三個時期，並且敘述爲了從軍政期一躍而進入憲政期，人民的訓練時間完全沒有，不能實行這種建國方略是最大的過錯，但實際上，要照這種計劃實行恐怕也不是當時狀態所允許。）

做了大總統以後的袁氏，在五月裏把政府再度遷移到北京，和這政府遷移的同時，魯迅也到北京去了。他居住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的藤花館裏，就任了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更昇任爲教育部僉事。

革命停止了進展。對於袁氏的就任大總統，革命派深慮其將來的專權，便制作了限制大總統權限和擴大參議院權限的臨時約法，在正式制定憲法以前必須依據這臨時約法實行，但在參議院裏佔有大多數的國民黨（中國同盟會的後身），和袒護總統的一派之間，常不斷地鬥爭，至第二年，即民國二年七月，遂展開了政府軍和國民黨軍的戰爭（第二革命），當時國民黨敗北，孫文逃亡到臺灣。

袁氏於民國三年一月命令停閉議會，接着又公佈了以大總統爲中心的修正約法，它規定一切的政權都隸屬於大總統，這專制的野心更擴大爲帝制運動。

但是隨着這帝制運動的發展，國民黨一派猛烈的反對當然不待說，即袁氏親近的部下也有不

少的反對者，加之日、英、法、俄等國發出反對帝制的共同警告，而且雲南的唐繼堯宣告獨立，組織討袁的軍隊（第三革命），接着貴州、四川等立即響應，袁氏便在這種日形顯著逐漸蔓延起來的反袁空氣中，於民國五年六月悶悶地病死。

袁氏死後，副總統黎元洪就任了大總統，依從國民黨的宗旨，聲明復活舊約法和舊國會，但革命的基石並沒有鞏固，革命的成果依然遲遲未見，舊官僚軍閥常用武力來制壓言論界。這時期的魯迅的生活可以從他的親友許壽裳所作的年譜中看得出來：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三十二歲。

（前略）

八月，任命為教育部僉事。

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八月，由海道歸京。

十月，公餘校「稽康集」。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三十五歲。

一月，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蒐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紹興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

是年，仍蒐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是年，仍蒐集研究拓本。

讀着這樣的年譜可以看到些什麼呢？魯迅自己對於這時期的生活曾經說過如下的話：「S會館（紹興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

很明顯地，魯迅在箝制輿論的高壓下，力持緘默的態度，於是用抄古碑和研佛經的工作來掩蔽當局的注目。

(傳 迅 魯)

然而也正是這一時期，那種希望從現實政局的混亂、和特別是錯誤的禮教道德的悠久傳統之封建社會裏解放出來的、新文化的空氣醞釀起來了。這種新的替代的東西便是民治和科學精神。

而作爲這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的，是北京大學和「新青年」雜誌。北京大學裏蔡元培新任了校長，那裏的文學院院長兼「新青年」的主編者陳獨秀，乃是這運動的最先鋒和中心的人物。偶爾在民國六年，從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胡適那裏給「新青年」寄來了「文學改良芻議」，於是在這裏便燦爛地揭開了文學革命的幕。這文學革命的中心，是廢除古文體，用白話的體裁來寫作文章，如果更簡單地說，那便是言文一致的運動，但問題卻是非常的廣泛。這裏請看胡適的文章裏所提出的「八不主義」罷。所謂「八不主義」，就是這樣的八條：

第一，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

第二，不摹仿古人。

第三，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

第四，不作「無病呻吟」的文字。

第五，不用套語爛調。

第六，不用典。

第七，不重對偶。

第八，不避俗語俗字。

這些條文都是消極的語調，但是這裏的第八條卻可以說是真正地提倡着白話文章的，這一條才是以上七條的結論，同時那七條，可以說是這最後一條的內容的說明。但是，丟開那七條的說明，單說這最後的白話文章的一條，那麼言文一致的文學未必是胡適的新發明，過去如「水滸

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許多的文學著作都是用白話文來寫作的，祇是並未作為文學的主流那樣地發展着，而且這些作者，也從沒有在正統文學的意識下寫作，所以胡適的主張使用白話的文學，可以說是活的文學，是最初意識的地主張「用白話表現的文學是正統的」。基於這樣的理由，白話文學這東西在過去已經存在，但在一般人的寫作古文體的文章，非常地偏重於形式，且完全是內容空虛的點上看來，這文學上的革新，比起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來是要更其偉大的。這裏便有詳悉當時情形的周作人的文章：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內容，古文中可以沒有這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內容便作不成。白話文有如口袋，裝進什麼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都不裝。而且無論裝進什麼，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古文有如一隻箱子，只能裝方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他空着，任何東西都不裝。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譬如遠道接得一位親屬寫來的信，覺到對他講什麼都不好，然而又必須回答，在這樣的時候，若寫白話，簡單的幾句便可完事，當然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則可以套用舊調，雖則空洞無品，但八行書準可寫滿。」

文學革命運動，最初開始於胡適和陳獨秀兩人，後來加入了錢玄同和劉半農，由於他們四人的合作，一瞬間在文化界裏印下了很大的足跡。

關於這文學革命，後來周作人發表了與胡適不同立場的見解。且不管這兩種議論到底是哪一種比較地正確，不過周作人的議論也不失為一種見識，且因為他從中國文學的古來流派說起，說來費辭，這裏且簡單地介紹一下。根據周作人的意見，在中國文學裏自古以來可以分為言志派（詩言志）和載道派（文以載道）的兩種不同的潮流，但這兩種潮流常常此起彼伏，不絕地相互

交替起伏着，例如在晚周是言志派，在兩漢都是載道派，在魏晉六朝又是言志派，後來的唐朝又是載道派，嗣後在五代，兩宋，元，明，明末，清，民國等各時代間，又可以說是交互地興廢着，從這樣的見地看來，民國以後的白話文學，則決不是像胡適所說的那樣，是自古以來的文學的唯一目的物，而應該說，那是永遠連續起伏着的，言志和載道的波型線的，恰巧遇到「言志」這一波浪時候的形態。關於這兩派消長的狀態，應該詳細地說明，這裏且略去不談，而關於這民國的新言志派採取白話的形式，那是因為白話適宜於表現「言」今日的「志」，至於以為古文是已經死了的文學，以及簡單地區別古文和白話的胡適的主張，他是表示不能贊同的。

再回溯到上文，那緘默的魯迅的內心，對於這運動恐怕是不會沒有關心的罷？然而他卻始終緘默着。在這裏，可以一說周作人的動靜，他在出版「域外小說集」失敗的一年，和日本女子羽太信子戀愛而結婚，繼續居住在東京，從事於研究希臘語和日本語，但一九一二年國民革命成功的一年，即在他二十八歲時他歸國了，就任浙江省教育司的省督學職位，不久又做了紹興的省立第五中學教員，繼續四年的教員生活。魯迅則居住在都市，他和居住在鄉下的時候不同，但在寂寞之中靜靜地充實和鞏固着他未來事業的基礎則是相同的。直到民國六年（三十三歲），他才真正地舉起了文學革命運動的烽火，到了新文化運動旺盛的北京，立刻做了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所的編纂員，半年以後，又做了北京大學的文學院教授。

第五章 「吶喊」

民國六年夏，魯迅的舊友錢玄同，到紹興會館的寓處來拜訪他，要他替「新青年」寫作小說。魯迅答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只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錢玄同便回答：「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第二年，魯迅便用「魯迅」的筆名寫了最初的短篇小說（嚴格地說，他的開始寫作小說是在教員時代，已如上述。）「狂人日記」。當然是用白話文寫作而成的，它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

這小說有着抨擊家族制度和禮教的根本精神。在這意義上，和「新青年」的精神是並行的，同時，它未必是獨特思想的作品。只是魯迅根源於這樣明確的目的意識而寫作，把目的意識作為目的意識地成熟地處理，完全不用說明體的文字，使全篇貫穿着狂人的感情和神經，而完成它在藝術作品中傑出的地位。關於這篇作品，正如他自己的告白，是根據那時為止讀過的百篇左右的外國作品以及僅有的一些醫學知識而寫作的，但從這題目設想起來，可以知道他特別是果戈里的愛好者，這必然是受了果戈里的「狂人日記」的影響罷！

這篇小說的成就是很大的。它非但是僅僅作品本身優秀的問題，且在白話小說最初佳作的一點上，具有了兩重的絕大的意義。他實在是把最初的光明投給白話文學前途的人。而魯迅的名

字，也因此一躍而在文化界受人注目了。這裏，魯迅纔真正地，漸漸地，作為文學家而開始發揮他的才能了。這時候他是三十八歲，從醫專輟學而志向於文學運動算起，已經是第十二個年頭。

從此魯迅便連續地寫着小說，同時也寫了不少的隨筆，但不能忘記的是，魯迅寫作的根本目標，畢竟是在中國的人性的改革。爲了這原故，無論什麼文學上的事情，魯迅總有針對着這樣目標的心情，那過去幾年間的緘默生活中，這樣的心情未必絕滅，但顯然，他是並沒有想做小說家的意慾和野心的。

當他最初的小說發表後的第二年，即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便產生了所謂「五四運動」。這運動起因於對政府出席凡爾賽會議的中國代表公佈了承認割讓山東的新聞，結果以這作爲藉口，急進的青年學生們對於執政者便爆發了從來未有的不滿，那北京的十三個大學的學生團體聯合舉行了示威運動，學生隊便襲擊了親日派的大臣曹汝霖的私邸，當時曹汝霖早已逃逸，恰巧遇到躲避在甕中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便把他拖出鞭打，更在搗毀了房屋和家具以後，把這全部住宅縱火焚燒。

這運動受到全國的絕大支持，引起了學界未曾前見的混亂，結果曹汝霖和章宗祥被撤職，學生方面得到了全部的勝利。這種勝利深深地刻劃在中國學生的心裏，在以後的每次事件裏，便都成爲學生運動勃發的原因，他們是何等重視這勝利的意義呢？後來他們稱這運動爲「中國的文藝復興」，於此也可見重視的一斑了。

在這一年裏，作爲「新青年」友友的雜誌「新潮」創刊了，同樣的文化雜誌「少年中國」也創刊了，接着在民國十年，魯迅，周作人，葉紹鈞，沈雁冰（後筆名爲茅盾），謝冰心女士，落華生，鄭振鐸等人組織了文學研究會，以「爲人生的藝術」爲標語，在「小說月報」上開始了光

輝的活動，隨後第二年，和這抵抗的，以「藝術至上主義」標榜的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都是日本留學生）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創造社。另一方面，在民國九年，由於業已退出北京大學的陳獨秀的領導，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新文化遂以決河之勢，氾濫在中國社會裏了。

在這樣的空氣裏，魯迅連續地寫作着。其中民國十年在「晨報」副刊用「巴人」的筆名連載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惹起了轟然的反響。（這後來翻譯成各國的語言，被全世界人所知道，同時也使魯迅的名字成爲不朽。）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阿Q，那他是中國人的代名詞。這是中國四千年的傳統製造出來的一個可悲的性格。他是象徵着自大，既無反省，又無意志，只是被支配在因襲的慣例和目前的利益裏的，非常貧弱和頹廢的民族性的一種人格。

阿Q的描寫方法是一種諷刺的手法，這作品顯然是一種諷刺的作品，但事實上，它是在底蘊之中祕藏着愛情的冷徹的純粹現實主義的作品，愈是現實的地描寫，阿Q的特殊性格在作品裏愈是帶着諷刺的外貌。但要是說，真的諷刺作品透徹着現實主義的話，那這作品在真正的意義上的確可以說是諷刺作品了吧？

在魯迅的「阿Q的成因」的文章裏引用着一節高一涵的文章，他有趣地說着這作品的「一種性格」：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更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爲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

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

就這樣地，這作品碰到了所有中國人的要害。他不能坐視於昨日為止的舊中國人的姿態，而首先把這些自以為新中國人而得意洋洋的人們的心臟有力地刺入。當他最初到東京來時便開始了的人性和國民性的追求，到這裏纔開放了盛大的花朵。而這裏可以看到魯迅的作家力量的大成，以及一生顧到國家和國民的個人的偉大。

在這同一時期內，他還寫了作品「故鄉」，但這好像是在民國八年十二月爲了關閉故鄉的房屋而寫出回鄉時的經驗的作品，這中間他寫出了和在本書第一章說到的閩土的分別。他這樣寫着：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睛眼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藍布，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枝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阿！閩土哥，——你來了？……」魯迅說着，但閩土用恭敬的態度說：

「老爺！……」

然後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二十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

接着他又說：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

後來魯迅問起他的景況。他卻搖搖頭說：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不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得爛掉。……」

在這次歸鄉以後，爲了魯迅家一族的遷移，便把前些時候會買下了的公用庫八道灣的一所房屋，加以修繕，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遂居住下來了。這房屋至今還是周作人的住家，前年夏遊覽北京的時候，我也曾去訪問了一次，依據我的記憶，它有門，有看門的小屋，有圓型的門，有中庭，那裏面主要的房屋和普通的中國房屋沒有什麼兩樣，要是說到特別有着深刻印象的地方，那便是周作人的應接室及其旁邊的一間房子裏堆積着中外古今的書籍，以致餘下來的地方非常狹隘了，而從這門前的大街一直到裏面的路上，簡直像在沙漠裏的一般，鋪積着厚厚的灰塵。

由這房屋連帶說到的，是盲詩人愛羅先珂常常來到這房屋裏和魯迅一家的談天。我想這多半是民國十一年時候的事情。繼續着漂泊旅行的愛羅先珂，到日本以後來到了北京，居住在這房屋裏做了北京大學的講師。愛羅先珂一面打下點字●當作普通文字那樣地寫作着，一面卻需要一個能够用耳朵聽的讀書的助手，吳克剛便善意地擔當了這個職務，而且爲了工作的方便起見，也住在魯迅的家裏。魯迅便在這樣的閒談裏，由於他的親切的心，使愛羅先珂也非常愛好着閒談了。

● 盲人用鐵針打在硬紙上，成爲點字。——譯者

(傳 迅 魯)

愛羅先珂在吳克剛的幫助下終日從事讀書和勞作，只在晚飯以後休息的時間，他一面奏着七絃琴，一面唱着世界語的歌，或者像故事一般地，向吳克剛快樂地講述着自己故鄉的話，以至歐洲，印度，緬甸，日本甚至阿非利加等各國的話。

教育部的辦公完畢，回到家裏喫罷晚飯的魯迅，也時常加入了這會談，在愛羅先珂和魯迅之間，始終用日本語談話着。

這時候，不知道爲了魯迅把房屋讓給了愛羅先珂呢，還是以前已經是如此，那表門旁邊接連的小小的，天花板很低的房間作爲書房了。根據吳克剛的記載，魯迅在那房間裏伏案工作直至深夜，愛羅先珂也歡喜晚上工作，吳克剛也時常幫助工作直到夜深，當工作疲倦的時候，兩人一同散步到中庭去，這時在魯迅的房間裏一定是燈火紅紅地輝耀，有時在深夜裏他也高聲地讀着書。

魯迅在寫小說、隨筆的同時，還從事翻譯的工作。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和愛羅先珂的童話劇「桃色的雲」等，都是這時期的翻譯中的主要的東西。同時拓本的蒐集和研究依舊始終如一地繼續着，而且在民國十一年和十二年之間，校訂了「嵇康集」。在這許多工作之外，從民國九年秋起，他還做了北京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而開始講述「中國小說史」。

就這樣地，除了作爲教育部官吏的事情（遺憾得很，內容不詳）以外，他的工作是屬於小說，隨筆，翻譯等廣義的文學創作，以及古小說研究，有關國學研究的講義的寫作等，可以分爲以上的兩方面。但暫且丟開有關國學研究的東西，單說小說，隨筆，翻譯方面的工作，則這些工作雖有各不相同的方式，但這不過是從同一軀幹上分裂出來的不同的枝椏，它們有着一貫的性質，那就是常常說起的改革中國人的人性的欲望。這裏，讀者也許要懷疑魯迅終究是以文學爲工具的社會改良主義者，這決不是的，他是值得我們尊敬的第一流小說家和藝術家。（但他是不僅僅止於小說家和藝術家的。）而他自己，雖未必有做藝術家的志願而偏偏做了優秀的藝術家，這我覺得是有趣的。我以爲，其原因之一，當然是由於他的始終一貫的文學研究，其另一，乃是由

於他的天性豐富的藝術天分。

魯迅從民國七年到十一年寫了十五篇的小說。這些小說集成一書，魯迅把它題名為「吶喊」。而他則有意無意地已經成爲一個「小說家」了。

關於創作集「吶喊」，創造社派的批評家成仿吾曾批評它是「庸俗」的東西，但卷末的取材古代的作品「不周山」一篇，卻被推爲最傑出的作品，以爲魯迅將從此漸漸地進入純文藝的宮庭，魯迅對此，因爲「不周山」的後半篇多少帶着不純粹的意識，覺得非常的不滿意，所以在「吶喊」的第二版（以及後來）裏，特地把「不周山」抽出，這給予成仿吾痛快的一棒。（這篇作品，後來編入了純粹歷史小說集的「故事新編」。）

第六章 「彷徨」

民國十二年，他離開了周作人，遷居到甌塔胡同六十一號，更在這一年的年底，買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房屋，第二年五月，便遷居到那裏。魯迅的遷居是由於和周作人的不睦，但詳細的情形卻不很知道。在這兩年裏，他在學校編著的「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兩卷出版了，又從民國十二年一起，在原来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高等學校之外，並兼任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世界語專門學校的講師。大概是工作的繁忙吧，在這民國十二年一年中他完全沒有發表過小說，但到民國十三年，卻連續發表了「祝福」的一篇小說。這一年，他更和孫伏園，劉半農，周作人等十多個人共同組織並發行了一個週刊文化雜誌「語絲」，他寫着社會性的短評，再到第二年即民國十四年，他和幾個同志發起組織未名社，開始把外國文學作啓蒙式的介紹，更發行週刊（後來是半月刊）文藝雜誌「莽原」，他任編輯的職務，他的活動是漸漸地加強起來顯著起來了。

在魯迅上述的各種活動裏，如果單單說到關於「中國小說史略」，則該書是他在北京大學的講義的要略，他在長長的歷史過程間，把多姿多態的中國小說，用獨到的各種的分類法編列了整齊的系統，這在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工作上，可以說是有着紀念碑式的成就。原來中國的小說，都作為通俗讀物一般地看待，素為有識者所漠視，因之關於小說和小說書的記載都是非常片段和瑣碎，僅殘留於過去學者的一些筆記之中，所以把這些材料蒐集起來，並且把它小說史式的分類整理，那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因此，該書一旦問世，便立刻博得文化界的絕讚，而由於它的刺激和鼓勵，便造成了許多後起的研究者不斷地工作，這在新文學方面，他的作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史

家的大功績，由於該書的出版而奠定了基礎。

然而這時候的社會狀態是怎樣的呢？在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卻爆發了所謂五卅事件。在上海的日本內外棉工場殺死了中國的工人顧正紅，這事件引起了上海中國市民在租界內的大示威，當示威的行列進行的時候，若干學生被租界巡捕拘捕起來，羣衆便奪回了學生，並向南京路的工部局巡捕房襲擊，這裏，爲了英國（印度人）巡捕的發槍射擊，被槍殺了好幾個人，於是事件更形擴大，成爲龐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了。在上海，起初是八十萬工人的罷工，接着便陷入學校罷課商店罷市的空前混亂現象。他們反抗的目標集中於英國，在廣東更組織了排英運動的機構，頑強而且激烈地進行着。

在這運動的背後主使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已在前年孫文的聯俄容共主義下與國民黨合作，同時，向來的祕密結社至此也在社會上公開了起來。當時從蘇聯派來的鮑羅亭，加倫等人已到廣東做了孫文的顧問，鮑羅亭主持黨的組織訓練，加倫主持軍事訓練，又從蘇聯歸國的蔣介石，創立了軍官學校，積極地養成革命將校。由於受到蘇聯影響的國民黨態勢的新展開，中國的新文化界和六年前的五四運動的當時比較，顯然地已帶有了濃厚的社會主義的傾向，這運動從知識階級的運動，明顯地發展過渡到勞動階級的運動，前者是基於實驗主義的科學主義，後者則是漸漸地開始傾向於唯物史觀的科學主義。

也許是這樣的一種勃興起來的新社會的氛圍驅策着魯迅，使他開始了各種的活動。

可是，跟着社會的進化思想，以及青年學生們全面支持了進步主義者的反面，必然地引起了官僚軍閥的嚴厲的壓迫。在北京，教育總長章士釗首倡着復古運動，出版甲寅週刊作爲這復古運動的機關雜誌，並且剛巧在這時候，又任命具有頑固的封建思想的楊蔭榆女士，爲女子師範大學

的校長，竭力壓制着學生的進步傾向，因此學校起了騷動，於是章士釗下令大彈壓，而且發生了封鎖學校的事件。身為這學校講師的魯迅，對於這樣的處置極度憤慨，便和多數的職員組織了校務維持委員會，在另外的地方繼續開課。爲了這個原故，他被章士釗革去了教育部的職司，並且，不單在章氏一派支持下的「現代評論」雜誌的陳西澄，明顯地寫着歪曲的論調來責罵學生，更暗暗裏譏言學校的騷動是魯迅他們的陰謀，且該雜誌的明星評論家唐有壬等，在上海的某報上投稿，說魯迅是受莫斯科的命令，魯迅始終和這些反動的人們忙碌地戰鬥着。

但第二年一月，章士釗一派卻被免職，女子師範大學恢復了原狀，魯迅又回到教育部就任了原來的職位。

在當時，陳西澄的攻擊魯迅的筆調最爲辛辣，說魯迅有着刑名師爺的氣質，並且斷章取義地捏造事實。他常常像下面那樣地尖刻地痛詆着魯迅：「他（指魯迅）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裏，曾經說到不想翻譯文學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說：「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論此事，卻是對牛彈琴；至於兩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卻時常有，幾多醜態和惡行，都在這新而黑暗的陰影中開演，不過還想不出作者所說似的好招牌。」雖然這麼說，可是你（詩人徐志摩）不看見他不恥於做「青年叛徒的領袖」嗎？他曾經寫過：「看見官僚便立刻板起臉來有着要嘔吐的樣子。然而，然而他現在做了教育部的僉事。要是根據他自己的自傳，那他從民國元年起始終做了教育部的職員。因此，他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在教育部長裏，曹錕賄選大總統的時候在教育部長裏，那「無恥的代表彭永彝」做總長的時候也在教育部裏，甚至在「無恥的代表章士釗」把他免職以後他更大聲地吶喊：「區區僉事之類，何足道哉！」可是這裏，他怎樣地正揪着他的後任者呢？以爲無足重輕的人是怎樣地「慷他人之慨」呢，這樣，這樣，……還配稱爲「青年叛徒的領

袖」嗎？」（譯文）

在這樣的狀態裏，魯迅寫了無數的隨筆雜感之類，翻譯了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此外並寫了十一篇小說，後來把這些小說集成一冊時，把它題名為「彷徨」。

「彷徨」中的作品，和「吶喊」時代的作品比較，不能說是有着顯著的不同的，大體上講，可以說他依舊是銳利地諷刺着中國人的舊習和頹廢，但這裏已沒有了以前那樣的沈重，失去了以前常常可以見到的悲愁的感傷美，而增加了透澈的淒涼。雖然外界的新文化運動益趨於熾烈，然而他卻相反地變得絕望的了。「孤獨者」的最後，他這樣地寫着：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着嘴，口角間彷彿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道可笑死屍。

「敲釘的聲音一響，哭聲也同時迸出來。這哭聲使我不能聽完，只好退到院子裏；順脚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中略）

「我快步走着，彷彿要從一種沈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

這樣地寫着時，他對於作品中主人公的「用自己的手製造着孤獨，又把它擱在嘴裏咀嚼味道的人」的一生覺得可悲，這就是他自己對於生的思想。就這樣，漸漸地他和文化界一般人的步調不同，帶有了孤高的風度。

在這時候的他的散文詩（他寫過二十多篇的散文詩）之中，有題名為「求乞者」的一篇，它更說盡了他當時的灰色的心境——

我順着剝落的高牆走路，踏着鬆的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露在牆頭的高樹的枝條帶着還未乾枯的葉子在我頭上搖動。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夾衣，也不見得熱戚，而攔着磕頭，追着哀呼。

我厭惡他的聲調，態度。我憎惡他並不悲哀，近於兒戲；我煩厭他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夾衣，也不見得熱戚，但是啞的，攤開手，裝着手勢。

我就憎恨他這手勢。而且，他或者並不啞，這不過是一種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無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給與煩膩，疑心，憎惡。

我順着倒敗的泥牆走路，斷磚疊在牆缺口，牆裏面沒有什麼。微風起來，這秋寒穿透我的夾衣，四

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將用什麼方法求乞：發聲，用怎麼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

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我將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將得到自居於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

我將用無所爲和沈默求乞！……

我至少將得到虛無。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魯迅自己對於國學有精深的造詣，但他以為國學對於青年學生是無用的。他曾說：

「我看中國書，總覺得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但除了印度），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都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呢。」

這篇文章惹起了一部份人士的非常的激憤，甚至有主張他應該「脫離中國的國籍」的。

在女子師範大學的魯迅的學生中，有原籍廣東的叫做許廣平的學生。她是關心國事，且富有廣東人那樣的果敢氣魄的女性，常常寫信給魯迅詢問着各種的事情，因為魯迅答覆了她，所以兩人間的信札便開始往來了。在魯迅的回信裏，率直坦白地說出魯迅的心懷，因為非常的有趣，這裏且介紹其中的一封信，先是廣平女士的信裏這樣說：

「攻打現時「病根的工作」，欲「最快」，「有效」而不「很遲」的唯一捷徑，自然還是吾師所說

的「火與劍」。自二次革命，孫中山逃亡於外時，即已覺悟此層，所以竭力設法組織黨軍，然而至今也還沒有多大建設。況且現時所急待解決的問題，正是刻不容緩，倘必俟若干時籌備，若干時進行，若干時收效，恐將索國魂於枯魚之肆矣。此杞人之憂也。所以小鬼之意，以為對於違反民意的亂臣賊子，實不如仗三寸劍，與以一擊，然後仰天長嘯，伏劍而死，則以三數人之犧牲，即足以寒賊膽而不敢妄動。為犧牲者固當有膽有勇，但不必使學識優越者為之，……」

對於這事件，魯迅的回答是這樣：

「來信所說的意見，我實在也無法說一定是錯的，但是不讚成，一是由於全局的估計，二是由於自己的偏見。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兩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至於壞種，則警備極嚴，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還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壞影響，例如民二，袁世凱也用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錢僱來的奴子，試一衡量，還是這一面喫虧。但這時革命者們之間，也會用過僱工以自相殘殺，於是此道乃更墮落，現在即使復活，我以為雖然可以快一時之意，而與大局是無關的。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讚成。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嘗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的冒險，明知道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麼事情來的死症，然而終於無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罷。」

魯迅在給她的信裏把稱呼特地用「廣平兄」，和給普通男性的稱呼沒有兩樣。但後來她便做了他的愛人。而後來更做了他的妻了。

我在一九三七年首次會見的她，從這信札的來往時候算起，相隔不過十二年，但卻已經是單的她了，在會見當時的她的年齡，看來好像是三十七八歲，那白色的長形臉面上，並沒有像給魯迅的信札中所看到的那種熱情，可是，卻流露着一種智慧的正直的剛毅。她雖然似乎不能說是寡言的人，但比較上她是不善於社交，當同去的永松定相着她底手，相互談笑地說着「Too intellectual as a woman」時，她於是淡淡地笑了起來，不知爲了什麼，那種微笑的表情，至今還殘留着深刻的印象。

當她和魯迅的戀愛過程中，在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便發生了所謂「三·一八事件」。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張作霖和馮玉祥之間的戰爭，爲了防止奉天張作霖派艦隊的進襲，馮玉祥方面在大沽口敷設水雷，封鎖港口，因此八國列強送來了限期的最後通牒，對此，學生和工人團體向段祺瑞執政要求採取毅然的态度。三月十八日先在天安門前舉行大集會，然後這數千人的集團列隊走向政府公署去，但在門前被守衛者發槍射擊，死四十八人，負傷者近二百人。這事件使魯迅痛感北京早已不是人的世界。可是這慘案以後不久，下令逮捕北京教育會的主要人物六個人，並且更下令逮捕作家，教授和新聞記者四十四人。魯迅也是這四十四人中間的一個。他轉輾避難於外國醫院，同時寫了幾篇攻擊段執政的悲壯激烈的文章。在「序章」裏我引用的一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一句開始的一節以及用「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一句開始的一節，都是當時寫作的東西。他尤其是對於在女子師範大學的他的學生和他的作品的愛讀者劉和珍女士的被殺，憤怒悲涼到了極度，寫了長長的紀念文，這中間他這樣悲憤地寫着：

我在十八日早晨，我知道上午有羣衆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

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羣君的。而且又證明着還不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而更在末尾，他吐出了激昂和鼓動的話語：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觀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詭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這一年八月，他在同樣避難逃往廈門、任職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林語堂的斡旋下，被聘為廈門大學的教授，他終於丟棄了住過十五年的熱稔的北京，而伴着愛人許廣平女士踏着南下的旅程了。

第七章 廈門行

魯迅在上海和許廣平女士分別了。廣平女士爲了就任廣東的女子師範學校教職而到廣東去，因此兩人搭乘不同的船隻從上海出發到廈門和廣東。兩人相互地約定了在今後的兩年間，要積蓄一些錢，然後再實行同居。

魯迅在廈門住了不到半年，這期間曾經集成的一「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鈞沈」二書，他能够在學校裏出版。（因爲這二者都是學術的專門書，書店裏是不願意出版的。）

學校離廈門市約二里，在面對着鼓浪嶼的海岸上很可以眺望景色。魯迅授課的時間是每週六小時，（小說史二小時，專門書研究二小時，中國文學史二小時。）月薪四百元，最初他好好地努力工作一番，但漸漸地下去，在種種方面使魯迅覺得失望起來了。

（傳 迅 魯）

首先是有和當地人不通言語的不便。在那裏沒有教員的宿舍，且附近也沒有借宿的地方，所以只得把校舍裏的空房子略加修理以替代宿舍了。這些還只是微細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乃是校長爲孔教崇拜家，對於教員缺乏誠意，他所期待着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鈞沈」的出版也不表示同意，結果只把魯迅當作招牌以吸引學生那樣地，專門站在利用主義的立場上，加之，同事的職員中，在北京時代認識的，爲他像蛇蝎一般所厭惡着的人們，以及屬於這一系統的，狡猾的策士式的人物又新添了幾個。他當然不能和他們融合，採取了超然的態度，但又不能始終和他們不見面，便又不得已地常常用不愉快的眼睛看着對方。只有在北京時代的北京大學同事和親友沈兼士一人，和曾經是他的學生而編輯過「晨報」的孫伏園一同地共事着，而聽講的學生也特別地敬

慕他，甚至當地的學生在星期六不回到家裏，預備在星期日和他一同到街上去時充當翻譯，這樣的情形可以說是安慰着他的心，但亦僅僅祇是安慰而已，不能掃除他心頭的鬱悶。

結果，他一天天地變得孤獨和陰鬱。他絲毫不想目前的事情，因而他的心是在一種空空洞洞的狀態裏。有時也偶爾寫些文章，但白天卻祇沈浸在依依不捨的回憶裏，於是他寫了回憶記似的「舊事重提」五篇。後來把這些和南下前寫的五篇合而成集，改題為「朝華夕拾」，它成為魯迅的許多著作中最令人愛讀的書。在這書的序文裏他說：「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會是我思鄉的靈感。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此外，魯迅又想取材不周山那樣的古代的傳說來寫幾篇小說，這也許是「奔月」和「鑄劍」這兩篇了吧？

這時候他最大而唯一的快樂便是和居住在廣東的許廣平女士的信件來往。廣平女士的廣東生活也不感到興味，所以也勤於寫信。魯迅把學校裏有關自己的消息，微微細細地告訴了她，他因為無處訴說，便只得寫下種種的不平了。試看十月六日信札中的一節吧：

「可是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國學院大佔勢力，□□(□□)又要到這裏來做法律系主任了，從此『現代評論』色彩，將瀾漫廣大。在北京是國文系對抗着的，而這裏的國學院卻弄了一大批胡適之陳源之流，我覺得毫無希望。你想：兼士至於如此模胡，他請了一個朱山根，山根就薦三人，田謙千，辛冢本，田千頃，他收了；田千頃又薦兩人，盧梅，黃梅，他又收了。這樣，我們個體，

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現在很想至多在本學期之末，離開廈大。他們實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還壞。」

另一方面，在這一年的七月裏，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爲了打倒北方軍閥而自廣東出征的國民革命軍，因爲蔣介石自蘇聯歸國後養成了的廣東軍官學校出身的少壯士官的優秀，因爲官兵都瞭解戰鬥的意義，因爲在各處戰線上獲得下層民衆的有形無形的援助，以及因爲運用了蘇聯式的游擊戰術，所以在破竹之勢下進軍北上，九月中早已奪得了武漢三鎮，佔領了長江線，如今更在江西一帶疾驅前進。

這裏作爲革命軍戰鬥對手的，在軍閥之中是比較進步主義者的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等五省統帥的孫傳芳，因爲這軍隊相當的頑強，所以革命軍也是非常地苦戰着。軍官學校畢業的少壯有爲的士官，也多半在這裏戰死，南昌更得失了三次，當最初革命軍入城的時候剃去了頭髮的女學生，在後來孫傳芳軍隊奪回以後，看見了便立刻斬殺，是這樣的悲劇，而近代中國的開始的時節，便連續地在這樣的大激戰之中。

這裏且岔開話題，談談曾經對抗過魯迅他們的文學研究會的，標榜着藝術至上主義並歌唱着自我解放之歌的創造社一派，這一派從五卅前後起，步入了激烈的左傾的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王獨清等的創造社舊同人，全部被聘爲革命根據地廣東的廣州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的文學院教授而前往廣東去，（當時加入了若干新的同人，在上海出版「洪水」半月刊。）其中郭沫若早已暗暗地懷抱着「不能被關閉在象牙之塔裏」的思想，在北伐出征的同時便毅然決然地以身作則，投筆從戎，入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做了那裏的副主任，以輔佐主任鄧演達的職務。

說到政治部，雖說不是從事於直接的戰鬥，但其勞苦卻和戰鬥員完全沒有兩樣，他們以不習慣的身體騎着馬，或連續地步行了幾十里，他們跨在馬上整夜不眠地前進，得不到食物而餓了幾天的肚子，在自己的附近爆裂的礮彈威脅着，他們常常身居前線，嘗盡了一切的艱難辛苦。

一天，和他一同工作的俄人顧問泰羅寧的翻譯紀德甫中彈戰死，他便在夜半作了如下的詩，暗暗地安慰着自己。

「回思夜襲險峻語，堅城不破矢不歸。今日成屍橫馬革，不禁清淚滴君衣。」

十月半的時候，接到了廣東中山大學發出的，給林語堂，沈兼士，魯迅三人的電報，說明該大學已改成委員制，各委員希望他們去任教。魯迅因為不滿於廈門生活，很想立刻到廣東去，但對林語堂情分難卻，未便成行，準備在學期終了時再走。而且很想和林語堂商議一同離開這裏。但爲了林語堂在就任文學院長的時候，校長接受了他種種的請求，爲了他沒有答應一同到廣東去，所以魯迅的廣東行也沒有實現。對於這，魯迅頗感到焦躁，而對於林語堂也不很滿意。他這樣地要到廣東去，實在是因爲廈門當地的烏煙瘴氣，不能久留，而且到了廣州，可以和廣平女士見面，自然也是他希望的。不過，他對林語堂的不滿，似乎並沒有積極的惡意。這從給廣平女士的以下一節書信中可以證明，且還可以看出兩人在學校裏的地位：

「散（會）後，一個教員和我談起，知道有幾個這同回來的人排斥我，漸漸顯著了，因爲從他們的語氣裏，他已經聽得出來，而且他們似乎還同他去聯絡。他於是歎息說：『玉堂（卽林語堂）敵人頗多，但對於國學院不敢下手者，只因爲兼士和你兩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尙可支持，倘你亦走，敵

人即無所顧忌，玉堂的國學院就要開始動搖了。玉堂一失敗，他們也站不住了。而他們一面排斥你，一面又個個接家眷，準備作長久之計，真是胡塗」云云。我看這是確的，這學校，就如一部三國志演義，你槍我劍，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這裏是在小島上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但國學院內部的排擠現象，外敵卻還不知道，（他們誤以為那些人們倒是兼士和我的小卒，我們是給他們來打地盤的。）將來一知道，就要樂不可支。我於這裏毫無留戀，喫苦的還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說了，他是否相信，也難說的。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自做我的事，他們想攻倒我，一時也很難，我在這裏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興。至於玉堂，我大概是愛莫能助的了。」

但後來，他托孫伏園向林轉達他的意見，說無論如何不能再留住在這裏。但林卻沒有任何的回答。不過後來，因為校長減少了文學院的經費，林語堂極度憤慨，辭去了主任的職位。因此，這時魯迅直接勸林離開這裏，林大為讚同。然而後來在和校長開談話會的時候，關於預算問題，林以辭職為要挾，向校長提出了強硬的抗議，但出於意料之外地，校長卻把削減經費的意思取消了。為此，林反而軟化了起來，且懇請魯迅再繼續一年，學生們也同樣地盼望着在學期終了的時候一同到廣東去，這樣便又阻撓了他的決意。

然而不久，他又斷然地決意離開這裏，向林提出正式要求，並勸他一同離去。林自己不能同意於立刻就走，但卻答應了魯迅自己的要求。

魯迅從這前一直到廣東以後的關於自己的處世態度，又確切地開始了深刻地考慮。這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在北京時代的許多人，尤其是幫助他的多數的青年們，都公然地向他倒戈了。為

了要知道他煩悶的心的推移，並要知道這些青年們的狀況，這裏且不厭重覆地節錄給廣平女士的有關這些事情的幾封書信：

「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拚命地做，忘記喫飯，減少睡眠，喫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將我做廣告來自利，不必說了；便是小小的「荜原」，我一走也就鬧架。（中略）」

「我早已有些想到過，你這次出去做事，會有許多莫明其妙的人們來訪問你的，或者自稱革命家，或者自稱文學家，不但訪問，還要求幫忙。我想，你是會去幫忙的，然而幫忙之後，他們還要大不滿足，而且怨恨，因為他們以為你收入甚多，這一點即等於不幫，你說竭力地幫了，乃是你吝嗇的謊話。將來或有些失敗，便都一哄而散，甚者還要下石，即將訪問你時所見的態度，衣飾，住處等等，作為攻擊之資，這是對於先前的吝嗇的罰。這種情形，我都曾一一嘗過了，現在你大約在正要開始嘗着這況味。這很使人苦惱，不平，但嘗嘗也好，因為知道世事就可以更加真切了。但這狀態是永纏不得的，經驗若干時之後，便須恍然大悟，斬釘截鐵地將他們撇開，否則，即使將自己全部犧牲了，他們也仍不滿足，而且仍不能得救。」（自十月二十八日函節錄）

又：

「在遭這年中，我很遇見了些文學青年，由經驗的結果，覺得他們之於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詰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因此我於遭退去就，頗有戒心，遭感也是頗唐之一端，但我覺得這也是環境造成的。」

「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攻擊，至多無非不能同北京

去，並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成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

（自十一月七日函節錄）

又：

「我在靜夜中，回憶先前的經歷，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只要於他有利。我在北京還麼忙，來客不絕，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釗們的壓迫，有些人就立刻來索還原稿，不要我選定，作序了。其甚者還要乘機下石，連我請他喫過飯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在運動他；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奢侈的證據。藉自己的升沈，看看人們的嘴臉的變化，雖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養工夫太淺了，有時總還不免有些憤激，因此又常遲疑於此後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積幾文錢，將來什麼事都不做，願自己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為人們做些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再做一些事，倘連所謂「同人」也都從背後鎗擊我了，為生存和報復起見，我便什麼事都敢做，但不顧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了，終於覺得太傻。前一條當先託庇於資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條則頗鹹，也無把握（於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實在難於下一決心，我也就想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自十一月十五日函節錄）

又：

「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然而他竟得步進步，罵個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裏去，也還要戮屍的樣子。所以我昨天就決定，無論什麼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個啓事，將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對於別人用我名字，則如笑罵等情狀，揭露出來，比他的嘮嘮叨叨的長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語絲，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種刊物。我已決定不

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自十一月二十日函節錄）

又：

「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於弄筆墨的，卻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爲社會的，他們都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而他們竟自以爲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自十二月二日函節錄）

魯迅幾次三番地在信裏透露了類似這樣的話。這裏最後，再引述在廈門的最後的，離開廈門三四天前（一月十一日發）的一節，以作爲這方面介紹的結束。

「這是你知道的，單在這三四年中，我對於熟識的和初相識的文學青年是怎麼樣，只要有可以盡力之處就盡力，並沒有什麼壞心思。然而男的呢，他們自己之間也掩不住嫉妒，到底爭起來了，一方面於心不滿足，就想打殺我，給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見我有女生在座，他們便造流言。這些流言，無論事之有無，他們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見面。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裏卻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如果我再隱忍，退讓，他們更要得步進步，不會完的。我蔑視他們了。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內幕，便使我自憐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雖然是沒有選擇的並列觀察，但從信札的內容上已經具體地寫出了魯迅的潔癖性和憤怒的感。關於青年們的倒戈並沒有一一具體地寫出，所以詳細的情形不得而知，但我想，那潔癖的性質在這裏是決不會有誇張的地方。不過具體地寫出來的，主要的有叫做長虹的青年的事情，他拜

託魯迅登載稿子，常常到魯迅住的地方來，後來魯迅才知道，他希望和廣平女士見面，他暗暗地思慕着她，但她和魯迅一同離開北京了，所以他立刻惡意地攻擊魯迅。爲了這樣的關係，魯迅便特別小心起來了，但一般地說，魯迅的心境多少帶有着被迫害者那樣的成分。而這樣的他的徵候，可以證明，在過去他是多少爲着青年們而盡心幫助過來的。

且略微看看廣平女士在廣東的生活罷。她生於廣東，她的家便是在廣東，在這一點上，便不同於魯迅的漂泊的生活：她是歸返故鄉了，但這生活卻決不是愉快的。她在她的學校裏新任了訓育主任的職務，此外還常常代理寄宿舍的舍監，在這些時候，從早上八時到晚上五時都在學校裏，晚上則做着自修的工作，從九時到十時需要預備明天的課程，在這樣情形下便可以說已絕無自己的時間。祇給魯迅寫着書信。然而爲學校財政的窮迫，薪金也被不斷地拖欠。但她依舊忍受着。然而出於意料之外的，而且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在這革命根據地的廣東，和北京沒有多大的兩樣，反動份子異常的多。在她學校的學生會裏佔有優勢的一派便是舊派。因爲這樣，到十一月初便發生了一件事情。

十月底，爲了召開廣東的學生聯合會的全體大會，各校應選舉派遺代表者，關於這，舊派爲了謀自身的有利，便計劃了種種的策略，但後來終於召集大會選舉代表。對於他們的策略，則惹起了別派學生的憤慨，而起紛擾，學校當局爲防止糾紛，禁止了兩方面的會議，但舊派方面不服命令，依舊開會，於是把校長冠以「反革命」的稱號，因此不久，在學校裏組織特別裁判委員會，審查的結果，開除了舊派學生二名。這時學生之中分爲反動派，中立派和革命派三派，其中反動派最有勢力，但中立派也不滿意於禁止召開一切會議，便與反動派共同開會，要求校方收回

成命，如果不容他們的請求，便有罷課的趨勢，另一方面校長接到了用英文寫的匿名信，上面畫着劍和槍，要他任意挑選一種，廣平女士身為訓育主任，是和處罰學生等的事情直接有關的職務，所以立刻被學生們用冷眼看待着她了。

糾紛總是不能解決，所以後來校長提出辭呈，不到學校裏來，並向教育廳呈請此後的校務暫由總務主任，教務主任，訓育主任等三人代理。但因為教薪不發，教師們也相繼離校，教務的事情也毫無辦法，而學校無錢，因此總務的事情也沒有辦法，如果糾紛再不能平靖，則訓育的事情也沒有辦法，在這樣的狀態下，廣平女士便決心辭職，但因為沒有校長，辭職書無人接收，所以陷於非常的困境。但自十二月起，爲了經費問題學校不得不休校，她雖辭職，卻一心一意地等待着校長的歸來，這期間總務主任和教務主任二人也離校了，只留下了她一個人，這才使她不能再隱忍下去，而離開了學校。在離開學校以後，她給魯迅的信中這樣寫着：

「實在，這裏的派別之紛繁和糾葛，是決非久在北京的簡單的人們所能豫想的。即如我在女師，有一部分人，覺學校之黑暗，須改革，同此意見，於是大家來幹一下而已。弄到後來，同事跑散了，校長辭職了，只剩我不經世故，以爲須有交代纔應放手的傻子，白看了幾天學校，白挨了幾天罵。這還是小事情，後來竟聽說有一個同事，先前最爲激烈，發動之初，是他堅持對舊派學生不可寬容，總替革新派的學生運籌帷幄的人，卻在說我是共產黨了。他說我誤以他們爲同志，引爲同調，今則已知其非，他們也已知我爲共黨，所以不合作了，云云。」

在廣東，仍舊把「共產黨」作爲排斥他人時候採用的一種措詞。把廣平女士這樣罵着的人，以爲她和校長廖冰筠女士屬於同類，因爲校長的哥哥廖仲凱，是屬於國民黨的左派的，他們便根

據這樣的邏輯而說着。

在魯迅和廣平女士間的信札裏，有很多不平和不滿的地方，好像相互地訴說着相互地安慰着，就在這相互地訴說，哀憐和鼓勵中，洋溢着身處異地的同志那樣的荒漠的感觸。

因此，魯迅對於廣平女士的稱呼，始終用着「廣平兄」，而廣平女士則時時用「迅師」和「先生」的字樣，但大部分是用「My Dear Teacher」的。

然而魯迅已經決定在明年的一月中旬離開廈門了。於是約有二十個左右的學生，要求魯迅設法轉學到中山大學去，其餘的學生則希望魯迅留任。但留任是辦不到了，所以留任懇請運動一變而為學校改革運動，學生們攻擊着學校和一部份的教授。被攻擊者竭力說着魯迅的壞話，以減輕自己的罪過。但魯迅只是默默地觀望着，忍受着。

而如今在學校裏起了偌大的騷動。魯迅便在這樣的空氣裏，在一月十五日自廈門出發了。他匆匆地和三個學生一同地走了。

第八章 廣東受難

魯迅在中山大學被任爲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郭沫若加入了軍隊，被一般人目爲共產主義者，因此深恐餘波所及，當時郁達夫以及其他創造社派的人們，已經辭去了中山大學教授的職務而逃向上海去了。

魯迅在幾個月裏和廣平女士再會的喜悅，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這在小說裏沒有，爲了要避免粉飾的描寫，且跳開這方面的敘述罷。

魯迅在這裏作爲革命的戰士而受到許多青年學生們盛大的歡迎，忙碌着出席他們的歡迎會。魯迅匆匆而來，預想這種空氣怕會有什麼亂子發生，所以在第一次的演講裏，他便聲明他不是「戰士」或「革命家」，如果是那樣的人，那應該在北京和廈門奮鬥一番，不應該特地逃避到這「革命的後方」的廣東來，但對於這，誰也沒有確切地注意到。

這樣地，訪問者，研究者，談論文學者，探求思想者，求寫序文者，求作題辭者，邀請演說者，都紛至沓來。其中，魯迅最怕去演說，但雖然如此，結果卻還有很多的演說會強要他出去。主要的乃是在香港的講演「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以及在嶺南大學的講演，黃埔軍官學校的講演等等。在黃埔軍官學校的講題是「革命時代的文學」，那終結的地方，他說：「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爲現在還是不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息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喫飯，

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砲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爲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會經是抱着文學救國之志而丟棄了當時學醫目的的人，想不到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但這未必不是他的反說，難道我們真要相信他會這樣思索着的嗎？

他初到廣東的時候，把中山大學校舍的最中央最高的叫「大鐘樓」的房屋充當居住的宿舍，但管理補考和開課的教務主任的職務是够忙的，他感到了說不出的不愉快。他得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祕藏題目，分配卷子，討論，計分，發榜，這些是當然的事情，但晚上貼好了榜，第二天早上卻不知給誰撕破了，於是只得再寫，並且還得辯論着分數多寡和及格與否的問題。他說他對於革命青年的優待他已經優待了，人家卻說他沒有優待；他說補救落第的權力不在他，人家卻說在他；他說他沒有方法，人家偏要說他有方法；他說考試題目不難，人家偏說是太難了；就爲這樣的事情，他的「鐘樓」每夜給埋藏在喧嘩裏。

爲了要避免開這樣的喧嘩罷，他在三月二十九日黃花節[●]的一天，從鐘樓遷居到白雲路的白雲樓。這時候國民革命軍已陷九江，攻擊杭州，用武力佔領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勢不可當地迫近了上海和南京，不久上海陷落，接着三月二十四日攻陷南京。到了四月十二日，不幸地顯示了國共分裂的形態。當然它波及於廣東，十五日廣東省內的工人，農民，急進的知識份子三千餘人被殺戮。

然而在廣東，像上述那樣大屠殺的同時，魯迅周圍的學生也有很多在共產黨嫌疑的罪名下被

● 清朝宣統三年的遺一天，革命黨數十人襲擊總督署，事敗身殉，葬於廣州城外的黃花岡，黃花節便是這事件的紀念日。

捕。其中也有因景仰魯迅而從廈門轉學到廣東來的學生們。魯迅大為驚愕，而出席中山大學各系主任的緊急會議，為被捕學生的釋放而百方奔走。但結果，終是徒勞無功。他憤而向學校當局提出辭呈。可是校長竭力挽留，為避免學生的離校而不許他辭職。然而他固執地拒絕留校。爲了這，在歡呼聲中迎接的昨日的他，現在卻都是反對着他的挑撥者，他們伺候在他的身邊，偵探着他，放出種種的流言，不久他的身體如同被監禁的一般，不僅如此，在白色恐怖大盛的時候，事實上他的生命是够危險了。

九月，市教育局主辦的學術講演會請他演講，他站立在講壇上，其實這是政權者叫他講演，看他情形，來決定殺他或者不殺。這種危險的情形他當然不會不覺察，但他在「魏晉的風度和文章以及藥和酒的關係」的題目下，吐露了他曾在文學史上研究的蘊蓄，解說了魏晉時代亂世的社會狀態和有關當時的竹林七賢的態度，堂堂地譏諷了當時的時世。結果得以保全了他的生命。這講演的内容是魯迅會想寫作而至死不得實現的「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片段。當魯迅病歿的幾個月前，增田涉在上海訪問他的時候，他一面躺在病牀上一面說着他的「中國文學史」的腹稿，根據他的計劃，就是：第一章從文字到文章，第二章詩無邪（詩經），第三章諸子，第四章從「離騷」到反「離騷」（漢），第五章酒·藥·女·佛（六朝），第六章廊朝和山林（唐），後來卻終於沒有寫出來吧，雖然我是很希望他在活着的時候寫作出來的。

是這樣的狀態，但在十月裏，他終於能够離開了廣東。

結果，他在廣東是失望的，祇是遭受到苦難而已。

同時，說到政治方面，因爲以前的國共分裂，政府分成兩個，即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汪精衛

作中心的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但武漢方面的共產黨，結果和國民黨左派不能圓滿合作，再加爲了作爲武漢政府後盾的湖南唐生智的軍隊也起了共產運動，所以唐生智便發動了七月政變，突然地把共產黨從武漢掃蕩出去。因此鮑羅亭和加倫等急急地逃回本國，至此，武漢政府事實上已經崩潰，它與南京政府合流了。

這裏應當一說留在共產陣營裏的郭沫若，他遭遇到這樣的窘境，便更鼓起了他的熱血，和最後殘留下來的最精銳的一部共產軍一同南下，越過了無數的山頭，轉輾苦戰着直向江西的南昌以及福建的汕頭而去。（但不久遭到慘敗，他在漁船裏潛逃至香港，更由香港到了上海，第二年三月便亡命於日本。）

在這樣的政局中，再加以廣東的失望和受難，使魯迅的思想和人生觀，也似乎開始漸漸地變化了。到這裏爲止的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我一向是相信着進化論的，總以爲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但這裏他才開始知道他底這樣的態度是錯誤的。在廣東一地，同樣是青年卻分成了兩大陣營，或投書告密，或助官捕人，他眼見了這些事實以後，他的從來的對於事物的看法是粉碎了，他不應該對於青年無條件地尊重。因而他開始接近了這兩大青年羣的一方面的人們。關於這，他說：「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但實際上，他的這種轉變的出發點，乃是爲了他苦惱着沒有權力去救助那些弱者，這是基礎於他的固有的一種人道主義的志向的。」

這當時的心境，他後來向增田涉清晰地說了如下的話：

「國民黨把有爲的青年投入陷穽。最初，共產黨是火車頭，國民黨是列車，革命是由共產黨領導國

民黨成功的，或者說共產黨是革命的功臣，所以學生們一同在鮑羅亭之前行了最敬禮。青年們也誰都感激着共產黨。但這回卻正因為他們是共產黨而把他們殺戮。這一點在舊式軍閥方面，卻是還好的。他們最初不能容納共產黨最後還是抱着這樣的主義。凡是不合他們的主義的，就不依從他們或反抗他們，還是對的。然而國民黨所採取的手段卻簡直令人髮指。那處死的方法又是殘酷之極。例如同樣是殺戮，那末在腦門上一槍不是也達到了目的麼，但他卻要斬首或活埋，即便是親兄弟也是這樣地殺戮。從此以後，我又得到許多誘人殺戮的材料，對於這樣的國民黨，我誠異常地憎恨。但憎恨着的人被抓去了。我的很多的學生被處死了。」

從廣東逃出的他，經過香港而到了上海。在這次的旅途裏，許廣平女士也是同行的。

第九章 上海生活（一）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魯迅賃屋於上海景雲里二十三號，開始和廣平女士公開地結合。

上海的學界聽到他來，便相繼地請他講演，僅僅在十月中，他已在勞働大學，立達學院，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幾個大學裏講演。

但到了這一年的十二月裏，他應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做了特約著作員，又在廣東時開始編纂的「唐宋傳奇集」上冊也出版了，此外則並無特別可以記載的。

假使在這裏到民國十九年三月左翼作家聯盟的創立為止，視作他的上海生活的第一期，則至此的二年數個月的他底文學上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翻譯和論爭。

這期間他所從事的翻譯工作，現在列記在下面：

- 一，小約翰（丹麥望·譚草作的長篇童話）
- 一，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的隨筆集抄譯）
- 一，壁下譯叢（日本和蘇聯的作家，批評家的論文編譯）
- 一，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板垣鷹穗著）
- 一，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和實際（日本片上伸著）
- 一，藝術論（蘇聯盧那卡爾斯基著）

一，藝術論（蘇聯蒲力汗諾夫著）

一，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的論文及演講集）

一，文藝政策（關於蘇聯文藝的會議錄和決議案）

翻譯的東西是那樣的，而創作卻完全沒有，即雜感類的文章為數也很少。可是這些文章的內容，卻都應社會和文壇的推移而變化着，其中佔有多數的，乃是關於革命文學的東西，是對於革命文學者極有用極需要的東西。

當時的上海文壇（在當時，上海文壇已成為中國文壇的中心）由於社會狀態的反映，左翼文藝思潮急激昂進。這左翼文藝的急先鋒，有創造社以及蔣光慈，錢杏邨等的太陽社，昔以「爲藝術而藝術」的信徒自命的創造社，早已改換了「革命文學」的招牌了。此外有胡適等主持的，被魯迅稱爲「正人君子」派的新月社，它站在反動派的立場上，但魯迅卻遭到這兩方面的夾擊而不得不孤軍奮戰着。創造社的代表批評家是成仿吾，太陽社的代表批評家是錢杏邨，他們各佈筆陣圍攻魯迅，或說魯迅是「有聞」，或說魯迅是「祇歡喜冷笑」，或說他是「毒筆家」，或從他產酒的故鄉着眼，罵他是「醉眼陶然」的。

魯迅便把以前在北京時有着關係，後來在北京被禁而改遷上海出版，並且這次是由自己負責編輯的「語絲」作爲機關雜誌，挾着以前那樣的銳鋒，毫不放鬆地把他們反擊，其論旨和論調大抵如下：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沈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爲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鍊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

也就活不下去，暈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喫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又：

「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着人稱託爾斯泰爲『卑污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纔揚起『革命文學』的旗子，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感』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裏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攬。」

又：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爲仇爲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磚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脣也快要不准紅了，對

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介紹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明其妙的。」

這裏的所謂「奉旨申斥」，便是指帝制時代的官員犯了過失，皇帝便命這官員跪在什麼門外面，派遣太監一人去斥罵他，這時，官吏要是賄賂一些小費，那罵幾句就可以完畢，要是不給小費，那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孫子。

在魯迅的論調裏，正如他的敵人所說那樣地未必沒有冷笑的、毒筆家那樣的地方，還有，原來是關於革命的事情，他以爲：人比文章更重要，因爲在文章之先這人早已沒有信用，所以他的話，便常常是苛酷地說着了罷。他最最討厭的，主要的是在這時候以爲各國都有的他們的商標主義，他並不是單單爲了反對而反對，這在他應戰的過程中，努力於翻譯並研究外國的左翼文藝理論的事實便可以證明。關於翻譯，魯迅自己這樣地解釋：「是從別國盜取了火來希望燒着自己的肉的意思」，但與此同時，由於這樣的意思，在事實上，還修正了他的同時代的謬誤。（作爲這時代的文壇收穫的，似乎便是以國民革命初期的動搖和革命反動化之後的青年的苦悶作爲描寫對象的矛盾的長篇三部曲「蝕」——日譯改題爲「大過渡期」。）

在魯迅的論敵之中，太陽社的錢杏邨的攻擊最是兇惡，他在「死了的阿Q時代」一文裏想清算魯迅的英雄思想，但魯迅並不受這些文章的影響，而在他的思想中漸漸地加強了階級意識，文章也漸漸地更加爽朗了。

這期間，在革命文學評論家中，在太陽社派和創造社派以外的別的派別，也有論述「攻擊魯迅不是無產階級的任務」而爲魯迅辯護着，此外有左翼運動家的瞿秋白奔走着，直到成立中國左

翼作家聯盟的一天，魯迅和反對派的論戰已經連續了二年多。

在這期間，魯迅在民國十八年五月，前往北京，因為母親住在北京，所以好像單單爲了省親而去似的。他大約隔三年總得和母親及其家屬會見一次。

在北京遇到了很多的舊友，除了被請到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去講演以外便沒有什麼事情。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發起了聘請他做教授的運動，然而他都謝絕了。他在離開北京前給他夫人的信裏這樣寫着：

「北京本來還可住，圖書館裏的舊書也還多，但因歷史關係，有些人必有奉送飯碗之舉，而在別一些人即領來搶飯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納履，而要使人信爲永不納履是難的，除非你趕緊走遠。

「D·H·●，你看，我們到那裏去呢？我們還是隱姓埋名，到什麼小村裏去，一聲也不響，大家玩玩罷。」

這以後，實際上，魯迅已不再想到這種無濟於事的事情，但現在的所以這樣說，也許是爲了有着某種的寂寞感罷？

這次旅行不到一個月，非常的短促。

又在這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廣平夫人做了母親了。孩子是男的。魯迅把他取名爲「海嬰」。

(傳 迅 魯)

●D是Dear的第一個字母，H是「害馬」(Haima)的第一個字母。關於「害馬」的來歷，原文的註釋顯然是錯誤的。譯者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和許廣平先生的談話中，據解說，是因爲她在學校裏被目爲搗亂份子，都稱她爲「害羣之馬」，「害馬」乃是這「害羣之馬」的簡稱。——譯者

第十章 上海生活（二）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魯迅主催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了。魯迅以爲對於反動派首先需要戰線的統一。在這成立會上他發表了强有力的演說。演說中他提出了今後他們應該注意的幾點：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不斷地持久，且必須增加自己的實力；第二，停止新文學者夥伴間片面的鬥爭，而應該擴大戰線；第三，應該提拔大眾的新的戰士等等，在第三項中他說：「我的敵軍是專專於吹播，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對於這種過去論敵們的怠於養成新戰士的辦法，我們必須嚴戒。」

魯迅的積極參加左翼作家聯盟頗使人們驚駭，一般人都以爲魯迅是轉向甚至投降了，有人放出了一被金光燦爛的盧布收買」的流言，但魯迅一概報以沈默的態度，他自己絲毫沒有轉向的意思。雖然他有態度的發展，但卻從來不會轉向過。他的態度的發展是在脫離廣東前後的事情。兩年來他和革命文學者的鬥爭，是單單攻擊着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學，決不是攻擊革命文學的本身，這在讀者們也必然是已經理解了。

在左翼作家聯盟創立以前的二月裏，有所謂自由大同盟的創立。魯迅也會參加，但與左翼作家聯盟創立同時，這自由大同盟卻被政府彈壓，同時浙江省黨部又呈請逮捕魯迅，所以魯迅不得不暫時逃開了他的寓所。

四月回到他的寓所，但不久在五月裏又遷居到北四川路了。這一次的寓所是在北四川路的北端的丁字路口，斜對着內山書店右側的三層樓洋房。

但在第二年的一月裏，卻又發生了他必須逃開寓所的事件。這是魯迅終身不忘的很大的悲慘事件。

這是魯迅北京時代的學生，當魯迅居住在景雲里的時候他居住得很近，且幾乎每天都要到魯迅家裏來的叫做柔石的青年。他是能够創作和翻譯的青年，魯迅和他以及其他的青年一起地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且在輸入外國版畫的目的下，設立了朝華社，出版了「朝花旬刊」以及其他的出版物。柔石是非常善良的青年，和同鄉的女性一同散步的時候總是距離着三四尺，但和魯迅一同散步的時候，很關心着魯迅好像怕他要給汽車和電車撞着，幾乎把魯迅抱住那樣地走着。這時候，柔石被某書店聘為雜誌編輯，而且這書店很願意出版魯迅的著作，所以託柔石來和魯迅商量抽版稅的辦法。商談以後，魯迅立刻照北新書局訂立的契約，抄了一份並且交給了他，他就塞在袋裏帶到書店去。然而這一去卻永不再見柔石的面目。第二天（一月十七日）他是被捕了。

還有叫做白莽的青年。因為在魯迅主編的雜誌「奔流」裏這位不相識的青年從德文翻譯了「彼得斐傳」投寄了來，所以魯迅寫信去要這德文的原文。但他自己把它帶來了。他是面色黧黑，容貌端正的青年。此後由於魯迅的要求翻譯了彼得斐的詩，又和魯迅見面了一次。第三次見面的時候，是在夏天，可是他穿着厚厚的長衣，臉上淌着汗。這時才明白這樣的他，是因為他自己已革命家，如今才被釋放，衣服也被沒收，所以從朋友那裏借來了這樣的衣裳。

魯迅非常慶幸他能够被釋放，便立刻給他稿費叫他回去買些衣服。然而這青年的姿態卻從此不再能够看到了，他在柔石被捕的同一天也被捕了。

在柔石和白莽那裏當然有魯迅的信和書籍。因此魯迅在一月二十日匆匆地焚燒了友人們的信札，和妻子一同避難到日本人經營的別墅花園莊。

一天魯迅看到了柔石給他同鄉的信。裏面這樣寫着：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鍊，開政治犯從未上鍊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爲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觀好！」

趙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信的背面卻又這樣地寫着：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

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

望轉交趙少雄。」

這以後傳出了各式各樣的消息。有人說他要是有了錢，可以被保釋出來，有人說他早已被解送到了南京，但這些傳說都不是可信的。也有很多人用電報和信件詢問着魯迅的消息，他北京的母親甚至憂出了病來。

天漸漸地變得冷了，魯迅每夜老是想着：在柔石那裏有沒有被頭呢？洋鐵的飯碗有沒有拿到呢？又在前年的年底，柔石回鄉住得較久，回到上海的時候，朋友們都責備着他，而他用悲憤的語調對魯迅說：「我的母親兩眼已經失明，她哀求似的要我多住幾天，我怎麼能够馬上就出來

呢？」魯迅想着柔石母子的眷戀的心，他想着這樣想着那樣地連夜失了眠。

不久，突然傳出了可靠的消息。這消息說是，在二月七日的夜裏或八日的早上，在龍華的警備司令部槍決了二十四個政治犯。柔石當然在這裏面，據說他中了十發的槍彈。白莽也在裏面，此外有李偉森，胡也頻等五個文學家。

魯迅陷於深深的悲憤。便在一個月明的深夜，他站立在客棧的院子裏。周圍都堆積着破爛的雜物，人們都已睡靜，萬籟沈寂。他就在這月色蒼白的靜寂的庭園，悲痛着他失去了很好的朋友，更爲中國失去了有爲的青年而悼惜。在這悲痛中他寫成了一首詩。這詩在「序章」裏已經寫出，且重寫在這裏罷：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魯迅寫的「無寫處」，實際上當時這樣的作品，的確沒有地方可以發表。只是後來，魯迅把這寫給附近的熟識的日本人山本初枝夫人。

關於這首詩，在後來得到了會是他敵人的郭沫若的賞識，而說「富於唐人的風韻，哀切動人，可說是絕唱。」在這次中日事變之初，他終止了在日本亡命十年的生活，拋棄妻子回到故國的時候寫出的詩，也用這首詩的同樣的韻脚，從這一點上，也可見他醉心於這首詩的一斑了。

但在二月末稍魯迅再遷移到舊居，從這一年的三月到十二月，魯迅應增田涉的請求，給他講解自著的「中國小說史略」以及創作小說。因此增田涉對於魯迅當時的生活知道得很明白，關於

當時的事情，他向筆者講述的談話，一如左記：

「魯迅先生的住所是在三樓，那可以說是書房兼應接室兼寢室的大約二十鋪席子的房間，以及膳室和雜務的三間那樣的房子。我大概在午後一時左右到內山書店去，魯迅先生也到那裏去，在那裏閒談了兩三個鐘點，然後一同到魯迅先生的家裏聽他講述一直到傍晚。魯迅先生會說：『祇有放鬆了四分之一的時間，』那就是說：他在天快亮的時候睡覺，中午的時候起來。

「充當書房的這廣闊房間的外側是走廊，再外面便是馬路，在走廊附近的地方擺着桌子，我們便並坐在桌子的旁邊，面對着外面，聽他的講述。魯迅先生的夫人大抵在我們的旁邊，靜靜地結着絨線，或者閱讀着書籍。魯迅先生原來是不講究家具的設備的，椅子完全是藤椅子，喝着中國茶的茶碗有些像咖啡茶碗的樣子。他非常地愛吸香煙，講述的時候幾乎總是口不離煙的。但這些不是上等的香煙，都是普通的香煙，都裝在煙嘴裏吸着。

「講述的時候總是常常用這咖啡茶碗盛着中國茶拿出來，到講述終了以後，總是拿出點心來。一星期裏喫着一兩次晚飯，在這些時候，大抵稍稍喝着五加皮之類的酒。且據說刺激了胃可以增進食慾，所以也喫着很青的胡椒。

「因為住所守着祕密，去訪問他的人非常的少，我在十個月中遇到的人，在文學家方面，也不過是郁達夫，許欽文等幾個，此外，在二三個日本留學時代的朋友中，還有北新書局的主人等等。比較常常看見的是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的他的弟弟周建人。魯迅先生常和他一同出去看電影。

「有時候，我偶爾在內山書店見不到他，便直接到他的家裏，敲着那扇門，於是魯迅先生必定親自來開門，接着又立刻把它關上了。

「魯迅先生居住地方的左邊，是住着叫做三井的日本人家，他似乎僅僅跟那些孩子們往來。右面的鄰居是英國人。在四層樓上的房間裏住着波蘭的女人，那裏非常吵鬧，尤其是孩子們，所以聽說曾經提出抗議過。」

「有時也和魯迅先生一起去看電影和繪畫展覽會。回來的時候，大概在啤酒店裏，喝着啤酒。有一次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那我想多半是看了繪畫展覽會回來的時候，站立在公共汽車的車站上，帶着五六個手下人的紳士把魯迅纏住了說着話。我有些驚愕，但魯迅先生卻以昂然的態度說着議論着什麼事情。那些手下的人四面圍住，骨碌骨碌地看着我們兩個人，態度非常的兇惡。不久，魯迅先生已經說了所有的話，這才默默地解了圍，無精打采地搭乘公共汽車而去了。我們眼看兩三輛公共汽車開去了以後，才搭乘電車，來到日本人開的啤酒店。這裏魯迅先生才說了：「那些東西是討厭的傢伙，所以在這裏稍微等會兒罷。」接着魯迅先生更說：「這些傢伙以前都說着我的壞話。可是現在卻說國民政府壓迫我不對的，我說我是反對政府的，政府使當然壓迫我。在廣東，有謠傳我從俄國得到十萬盧布的謊話，但如今這些做了政府走狗的東西，不知道又要說些什麼出來！」

這裏且連帶地敘述關於內山書店的事情。內山書店的店主內山完造，後來和魯迅有着深厚的友誼，但這時候卻剛剛開始了很親密的交往。魯迅幾乎每天那樣地，要到內山書店去談天，這在我也回想了一些事情。

當民國二十六年春我到上海去遊玩，且到該書店拜訪舊友內山完造的時候，在這主人的席旁火鉢的周圍圍繞着幾隻藤椅子，我坐在其中的一隻上，於是內山指着椅子旁邊的椅子說：「這是「魯迅先生的椅子」呢！」椅子依然存在着，然而那先前坐着的魯迅卻已經去世了，所以我有

着某種感慨地注視着這椅子，但這椅子和別的椅子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對於我，卻深深地留下了在那兒鋪着圓形小蒲團的淺蔥色的印象。這椅子是走進店堂的時候最先看到的一張椅子，它擺着和店的進門剛剛相反的方向。因此在這裏坐着的人的姿態，從外面或門口那裏看來，完全是在背後，別的不能夠看到。我想或者是由於魯迅特別意識着這樣的事情而坐在這張椅子上的罷？

這時候的魯迅非常地忙碌。接着是忙於兩次的避難，在民國二十一年一月，爲了上海事件而逃難到內山書店裏，隨後不久又遷移到舊英租界的內山書店，約有一個月。在魯迅，當大前年自由大同盟成立的時候，曾有人暗中勸他出國，預先告訴了他其中的婉曲（見「序章」），所以這以後，他便在不斷地覺察身邊危險的狀態裏，也因此，當內山完造歸返日本的時候，佐藤春夫的意思，也勸魯迅暫時到日本去，但魯迅給他的回信是這樣的：

「到日本暫住的事情，以前很想這樣，但如今我以為不很好，還是不去的好。第一，現在離開了中國，便弄得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寫作也就不可能了；第二，因爲要爲生活而寫作，所以一定得做新聞記者那樣的人，但兩者都是不行。加以佐藤先生和增田君都要爲我的稿子而大大地奔走，像這樣累贅的人到東京來實在是不行的。（下略）」（譯文）

又，這年的十一月裏，因爲母親生病，所以到北平去探望，留住在北平的期間，先後應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的邀請而講演。（這時母親的病痊愈了。）

但因爲以上海事件爲關鍵，政府極度嚴厲地壓迫左翼作家，傳說女作家丁玲被捕而被槍殺，

(實際上並未槍殺。)爲了對抗這種白色恐怖政治，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便成立了民權保障同盟，魯迅被蔡元培邀請，和宋慶齡等一同參加了，做了這同盟的執行委員。眼見到這運動引起了大衆極大的反響，政府便更暗使刺客行了這中心份子的一人楊杏佛氏。六月二十日在萬國廢館舉行的楊氏的喪禮，雖然有許多規勸魯迅應當顧到自己身邊的危險，然而他還是勇敢地出席，參加了殯儀。平素外出的時候，他總帶着房門的鑰匙，可是這一天據說特地沒有攜帶。他已決心不再回來了。然而結果，卻並沒有意外的事件發生。回來以後寫了一首詩，這詩在「序章」裏已有，這裏也不再抄錄了。

這時期的他的工作，大部分是翻譯和短評，已經更遠離了創作的東西。短評都是有關上述那樣的事情，針對着國民政府的社會批評和政治批評之類漸漸地增多，主要地都在報紙上匿名發表。而且更爲了不願留下筆蹟，大抵都由夫人廣平女士抄到稿子紙上，用投稿的方式寄到報館裏去的。

因爲是這樣的狀態，文壇上當然是非常的沈寂。這中間出現了政府御用派的民族主義文學，當然它在實際上沒有什麼成效。但國民政府的壓迫卻是變本加厲，在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更發起了新生活運動，開始努力於「以吾民族固有之美德即禮義廉恥矯正國民之日常衣食住行之規律」，由外形之訓練以促進內心之建設。」最初因採取恐怖主義，襲擊或破壞電影公司和書店，接着卻成立了「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強行查禁出版物。出版較多的人，當然都是這圈子裏的人，左翼作家的作品甚至連翻譯也被禁止，高爾基，盧那卻爾斯基以及其他左翼文學家的作品當然在被禁之列，甚至更及於梅特林克，梭羅古勃，斯脫林，堡等人的範圍。

在這樣情勢中陡然活躍起來的是由林語堂，周作人等提倡的一種韜晦的，諧謔的小品文運

動。他們在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論語」等雜誌上大大地活躍，但魯迅一派當然是反對着它，明顯地予以攻擊。

在這裏且加入一段關於魯迅爲人的插話。魯迅對林語堂會有種種的不滿，但因爲廈門時代的關係，他依舊把他目爲自己的友人，所以有一次他寫信給林語堂，希望他與其玩弄現在這樣的有閒的文字，還不如從事英國文學名著的翻譯，因爲以你的語學和文才來翻譯東西，則不僅有益今日的社會，亦將裨益於將來（他絲毫不勸他走革命的路），然而林語堂卻不能誠意地接受。

而周作人則反對以功利的目光處理藝術，他雖有反抗的精神，卻出於幽閒的心情。這樣的，便和戰鬥的魯迅之間，在性格上有着不同之點，那是明確地可以見到的。真正的原因，外間卻不很知道，其實他們兩人間的不和，從北京時代開始，已始終有着音信不通的絕交狀態。（這種絕交狀態一直繼續着，到魯迅死的時候，周作人也沒有參加魯迅的喪禮。）

這期間魯迅除了傾全力於翻譯和短評的工作以外，還有促進版畫藝術的運動。關於版畫，在中國從唐朝起一直到明朝，產生很好的東西，可是到了近代，卻完全絕跡了。但就中國黑白兩色的墨畫的發達看來，新的版畫也可以使它發達起來，他便首先著手於外國版畫的蒐集。德國，法國，英國，蘇聯，日本（日本的多半是浮世繪）的作品搜集了很多，但最多是德國和蘇聯的東西。

內山完造每次到他的家裏去總是看着這些版畫，他對於版畫也抱着很大的興趣。有一天，他請求魯迅出借所有的版畫。他想開一個展覽會讓大眾瀏覽。

魯迅立刻答應了，選了德國和蘇聯的優秀版畫約六十點，每一幅特地寫了說明的緣額。會場是在北四川路時上海購買組合，展覽期爲十月四，五兩日（民國十九年）。在中國這可以說是最

初的版畫展覽會，但展覽的結果，在日本人方面有相當的反響，中國人方面的參觀者卻非常的少。在當時的上海雖有美術學校四所，但在中國版畫卻還沒有普及，即使在專門家之中也很少具有興味的。不過在兩天中間，中日人士前往參觀的約有四百人，這也可以說是最初的成功。

第二年二月，魯迅決定把茶拉特考夫的「士敏土」的插圖（木刻）加以複印，在商務印書館用珂羅版印了二百冊左右，委托內山書店經售。然而買的人卻祇有日本人，中國人買的一個也沒有。

不久和內山完造又開了第二次的版畫展覽會。這一次是以法國小說的插畫為主，會場是在老靶子路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館的二樓。也許是會場的關係罷，參觀的人比前次更少，是失敗了。而知道了中國人對於版畫到底還沒有多大興味的魯迅，便有些悲觀了。

同年八月，內山完造的弟弟，即在東京的成城學園當手工教師並兼作雕刻的內山嘉吉，利用了暑假到上海來遊玩，和魯迅來往着，他偶然談到雕刻版畫的初步手法，這使魯迅非常高興，便集合了熱心用功的美術學校的學生十三人，開了講習會，因為內山不能講中國話，魯迅便自任翻譯，在夏天的沒有電風扇的悶熱房間裏，連續地講述了二十二天。就這樣地，中國最初的新版畫家便產生了。而隨着這十三人以後，便相繼地產生了版畫家的志願者。

於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在施高塔路千愛里開第三次展覽會的時候，參觀者頓時多了起來，帶着學生來參觀的中國小學校教師也有三起。在一部份小學校裏的圖畫科中，也有開始採用版畫的了。

但一般地說，中國的版畫術尚在幼稚的時期。

至民國二十三年，魯迅爲了這些版畫學生們的參考，便計劃出版蘇聯版畫的選集，並在日本出版了用珂羅版印刷的「引玉集」(初版三百冊在一個月裏售罄)。又在獎勵新版畫家的意義下，出

版了題名爲「本刊紀程」的版畫選集一百冊，自己寫作序文，自己選擇，也由自己負擔了印費。同時他又憐惜着中國的古版畫將要陷於消滅的狀態，便和居住在北平的鄭振鐸共同地冒着多大的物質損失和種種的困難，出版了「北平箋譜」一部六冊約四百種的堂堂的版畫集。這中間一百部是限定版，其中內山完造要去了三十部，此外全部都由魯迅和鄭振鐸承購，魯迅的部份大半都寄贈給日本，美國，法國，蘇聯等國的圖書館和友人。內山的部份放在店裏出售，立刻在日本人間銷售一空，便再訂購，而且中國人間也很有人希望買到的，所以又添印了一百部，內山拿去了四十部，但又立刻售完了。

魯迅又鑒於在中國識字的人僅佔全人口的十份之二，就大多數的人說來，中國等於沒有文字，根據這樣的見解，他便努力推行拉丁化運動。「文學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使文章簡易的運動，而拉丁化運動卻是使文字簡易的運動，是一種羅馬字的運動。但這運動似乎不能列舉較大的成績。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二月，蕭伯納在環遊世界的途次來到上海的時候，他被蔡元培邀請出席了在宋慶齡住宅的歡迎小宴。他和蕭伯納似乎沒有多多地交談，但當時上海的中國文人和新聞記者，對於蕭伯納不予好感的情形，卻寫了幾篇抗議口吻的文章。其中有寄給日本「改造」雜誌的一篇「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開頭他這樣寫着：「我是喜歡蕭的。這並不是因爲看他的作品和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麼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爲中國也常有模倣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討厭，這種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又在另一篇文章裏他說：「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

自己倒不笑。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對於蕭伯納不被中國文人和新聞記者們歡迎的事實，在魯迅也許感覺到這和他自身在中國文壇上所遭受的運命是相似的罷？

魯迅本來是常常害病的人，民國二十三年的十一月裏又病倒了。最初每晚發熱，沒有氣力，不想喫東西，請醫生診視說是流行性感冒。但是流行性感冒過了應該退熱的時期卻還沒有退熱。醫生遂疑為傷寒症，但卻沒有檢查他的血液。肺和心臟則沒有什麼，以為單是疲勞而發熱，所以任其自然，漸漸好轉。到了十二月裏，背和胸部又劇痛起來，陷於很大的苦惱。但亦沒有什麼大病，很快地復原了。

然而自此以後，魯迅的健康頓時衰微了。多年的用功，努力和苦鬥的結果，漸漸地開始影響到了他的健康。如果再詳細地說，那就是在魯迅的身體裏，在自己的不知不覺中，肺病已經加劇了起來，它已經變得表面化了，然而這時醫生雖還沒有這樣宣佈，而在他自己卻已經暗暗地覺得是這樣的了。

第十一章 上海生活（三）——晚年

這一章記述的，是民國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的最後兩年間的事情。在上一章裏應該說到的，是早在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魯迅已遷居到大陸新邨九號。這一次居住的地方，是在內山書店後面，和以前居住的地方不同，是從底層到三樓完全租賃下來的，至於以前的房屋，則如增田涉所說，當然是非常的狹隘，是令人住在裏面感到氣悶的房子。

然而魯迅的健康漸漸地消失了，簡直在這兩年之中，他沒有做什麼工作，但即使如此，他卻仍然翻譯了果戈理的「死魂靈」和創作了「故事新編」。「故事新編」是他早已預備寫的，是把古代的傳說變得小說化的集子，在民國二十五年一月，才漸漸地集合了八篇，編成一集出版。（因此魯迅的創作類的書，「呐喊」，「彷徨」以外再加散文詩集「野草」，「朝華夕拾」以及這「故事新編」，總共便有了五冊。）此外的工作，便是編印德國珂勒惠支女士的版畫選集，和友人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以及發行同人雜誌「海燕」等，得意的雜感文章的寫作卻不很多。但這時候的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情形是怎樣的呢？在上一章所說到的關於上海事變，這裏是沒有什麼可說，總之，這是對於東北事變的國民抗日情緒的反映，也是左翼派乘此騷擾的機會，活躍的結果。於是在事變以後，政府立刻加強了對於左翼的彈壓，這在上一章裏已經說過。

然而上海事變雖然結束，因上海事變而起的國內抗日風潮卻絲毫沒有緩和，反且愈加激烈起來。這種抗日風潮，在和滿洲接壤的華北地方尤其厲害。即使僅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到五月之間，華北的抗日反滿事件卻已有五十餘件，其中主要的有停戰區域內孫永勤的滿洲擾亂的援助，

在長城附近中國義勇軍的援助，在天津兩個親日的報社社長的暗殺事件等。這樣情勢的結果，由於日本的要求，在六月締結了梅津·何應欽協定。依照這協定，中國中央軍以及一切的附屬機關，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的軍隊，國民黨以及市黨部等，都從河北省撤退，又為避免將來發生同樣事件起見，規定給與華北機關在解決中日問題上有廣泛的自由取決權，華北各機關人選亦須根據這樣的目的而委任。隨後在七月裏，國民政府誓約不准國民黨黨部以及其他抗日機關的復活，同時公佈了敦睦邦交的命令，告諭一般民衆和團體對待友邦必須以敦睦的友誼，嚴禁排斥和惡意挑撥的言論和行爲。

但這以後，實際的情勢卻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所以，到了這一年的十月，遂組織了以殷汝耕爲首腦的，管轄着停戰非武裝地帶二十二縣區域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又產生了以宋哲元爲首腦的，叫做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特殊政權，它的管轄區域是河北和察哈爾兩省。

對於這樣的現象，反抗的火燄便在這年的十二月裏由北平的學生團體點燃起來了。當然它延燒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文學界裏立刻起了反應。這是以「國防文學論」那樣的形態出現的。民國二十五年的文壇，熱烈地推行着這運動。久已沈靜的文學家們便在抗日救國的目標下活躍起來。而這一年的六月，文藝家們先後結成了兩個團體。其一是文藝家協會，其又一爲文藝工作者。這兩個團體，本質上並不是對立的東西，但不同的地方是在：前者是主張縮結統一戰線，特別顯著地有着政治主義的傾向，而後者則是主張並不放棄文藝家各自的固有立場，同時努力於民族解放的工作。

前者是由郭沫若，郁達夫，茅盾，謝冰心，鄭振鐸等人領導的，共有一百零六名的會員，似乎最初是打算網羅全部的文藝作家。魯迅對於該會的旨趣未必反對，但他以爲「民族革命戰爭的

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種發展，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本於這樣見解，他並不加入文藝家協會，後來以魯迅為中心，另外組織了文藝工作者，魯迅以外的有力的份子，是巴金，張天翼，胡風，歐陽山，蕭軍等人，大概都是些接近魯迅方面的人。

但是所謂國防文學論，則正如這名字的意思，雖有作家的政治立場的標幟，卻可惜沒有文學創作上的標幟。因為這樣的不滿，才由胡風等重新提出了一「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於是「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這兩種主張為基礎展開了盛大的論戰，許多作家和評論家乃至魯迅，茅盾，郭沫若等都捲入了這論戰的漩渦，各各發表自己的見解。魯迅自然是同情於胡風方面的意見的。

到了這論戰的全盛時期的十月，在魯迅等二十個代表作家的署名下發表了一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這篇宣言的文字有關這方面的意見佔有了大部分。其要點如下：

「我們是文學者，因此也主張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複雜多方面的，各階層的；其在作家個人或集團，平時對文學的見解，趣味，與作風，新派與舊派不同，左派與右派亦各異，然而無論新舊左右，其為中國人則一，其不願為亡國奴則一；各人抗日之動機，或有不同，抗日的立場，亦許各異，然而同為抗日則一，同為抗日的力量則一。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我們不必強求抗日立場之劃一，但主張抗日的力量立刻統一起來。」

「爲民族利益計，我們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學或愛國文學在全國各處風起雲湧，以鼓勵民氣；我們固甚盼全國從事文學者能諒當前之所應急，但救亡之道初非一端，其在作家亦然。故在文學上我們寧主張各人各派之自由發展，與自由創作。」

「其次，我們主張言論的自由，急應爭得。言論自由與文藝活動的自由，不但是文化發展的關鍵，而在今日更爲民族生存之所繫。國民自由發表其救國意見，文學者自由發表其救國文藝，在今日已不僅爲人民之權利，亦且爲人民應盡之天職。除非不要人民愛國，否則，予人民發表救國意見之自由，在今日實屬天經地義。無可懷疑。因此我們要求政府當局，即刻開放人民言論自由；凡足以妨礙人民言論自由之法規，如報紙檢查刊物禁扣等，應立即概予廢止。我們深信唯有言論自由，然後能收全國上下一致救國的效果。我們敢籲請全國的學者，新聞記者，作者與讀者，一致起而力爭言論自由，促其早日實現。」

署名的有巴金，王統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語堂，洪深，周瘦鵬，茅盾，陳望道，郭沫若，夏丏尊，張天翼，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鄭伯奇，趙家璧，黎烈文，魯迅，謝冰心，豐子愷等二十一人。

魯迅在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又陷入肩部和胸部的激痛中。到了三月，突然氣喘起來，到了五月病勢更是惡化，連續地發熱沒有退清的時候。魯迅請來的醫生是日本人的須藤醫師。他和魯迅年齡相仿，富於經驗，且因爲親自診療，關於病狀等直率地說出，這是非常可取的，在病勢惡化的一個月來，這位須藤醫師指出魯迅的肺病，所以警告了他二三次。但魯迅並不介意，也不對人說。這也許是因爲魯迅對於自己的健康有着自信，並不害怕疾病，依舊做着各種的事情。但久病

以後，關心魯迅的朋友們商量的結果，到五月末，史末特萊女士帶了在上海唯一的西洋肺病專家的D醫師來訪，替他診治。但這結果卻依舊是可悲的：他稱頌魯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國人，但他宣告不久以後恐怕仍舊毫無希望；這要是在歐美人，那早在五年以前死亡的了。他的宣告使親近魯迅的人哭泣。但是在魯迅詢問以後卻要求D醫師不必開方。對於五年前應當死去的歐美人，即使開方也是無用的。但這以後，他卻用X光照射胸部，才知道D醫師的診視非常正確。魯迅的一面的肺已經完全腐蝕。魯迅已長久地患了肺病，不過在一二年前自己還沒有覺得，這因為魯迅的體質，實在非常康強的緣故。加之，魯迅的精神力的旺盛，也是很可以支持住他自身的疾病的。

魯迅以D醫師宣告後的心境，於九月五日寫了題名「死」的隨筆，這中間這樣寫着——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中略）但是，我也就留下一張籠。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害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五月裏得到 D 醫師的宣告，九月裏還寫着這樣的文章，因此當時，也許以為脫離了立刻死去的危機了罷？但他發表了對於親屬的遺囑，這樣看來，他還是有着萬一依舊死去了的顧慮的。

六月裏，增田涉到上海訪問魯迅。恐怕這時在魯迅也感到正值最大的危機，關於當時的情形，增田涉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寫着如下的一節：

「去年的六月初我到上海去遊玩，會見了闊別六年的先生，但這一次卻遷移了住所。躺在病牀上的先生非常地消瘦，簡直不相信這是先生的面目。然而先生的精神卻依然旺盛得很，說着中國文壇的現狀，舒洩着憤懣的感情，很勇敢地下定了決心去和某某等鬥爭打破他們的惡傾向。這是作家協會（即文藝家協會——著者）成立前的事情。他和六年前比較，似乎更感到銳敏了些，但雖然這樣，卻稍稍有些病態的精神興奮，這時我便擔憂了起來。

「幾天以後，又去看他的病而和他雜談的時候，應到了「蛋炒飯」這菜的意思，於是他約我今晚上了做了這菜要我去喫，晚上，我來遲了。已經喫了半碗蛋炒飯的先生，說着「我因為疲倦，先喫了，對不

起得很，」而立起來走向樓上的病牀，景宋夫人（夫人的號——著者）扶着他靠了欄杆，一步一步地走上扶梯，眼看著行走的先生穿着白色衣服的背後，我非常地苦惱，而意氣消沈了起來。也許是不會痊癒了罷！——忽然有了這樣的絕望感。在六年前的食桌上，先生總是喝着小茶杯裏兩杯五加皮，或者喝着三四杯老酒。然而今晚上，他卻說「我已經不喝酒了，但要是你歡喜，請用罷，」祇勸我一個人喝酒，酒是把玫瑰的花瓣浸在燒酒裏的玫瑰酒。只留我一個人坐在樓下，獨自飲着這空虛的玫瑰酒。」

從這時候起，也由於旁人的勸告，魯迅已抱着在暑熱時到別處去休養的想念。最初，因為須藤醫師的親屬在那裏，所以很想到日本的鎌倉去，但後來又覺得距離東京很近，顧慮到新聞記者以及其他的人們也許會常常要來糾纏，隨後又想到長崎，但在那裏沒有照應的人，住旅館價錢又大貴，住公寓，找房子，都覺得不很方便，遲疑的結果，終於在空氣不好的，狹窄的上海的家裏推過了悶熱的暑天。這次到日本去未能成行的原因，其一是因為他的健康不堪於長途的旅行，又其一，乃似乎是因為他的家庭財政並不是富裕的。

縱然在這樣的病中，當少數的親友來訪的時候，魯迅總是快活地率迎着。自己很清晰地談論各種的話題，要是疲倦，就倒在藤椅子裏靜靜地閉起了眼睛休息，一會，便又開始談起話來，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下，雖然客人擔心着魯迅的身體而想回去，但由於魯迅的健談而總不能夠立刻就回去。

魯迅在病中還不斷地計劃着這樣那樣的工作。有一個時候病勢轉佳，須藤醫師勸他多多地休養，就說：「因為看肺的情形非常的好，這樣下來，那可以再生活到十年，十年以後，你的公子也大了，夫人也大可不必擔心了。」魯迅聽了非常的歡喜，立刻把「死魂靈」翻譯，由夫人筆

記下來，在這樣的狀態下，因為不聽從醫師靜養，而且在事實上也沒有保持安靜狀態的耐心，他說：「無論如何我沒有那樣的習慣，不寫作又不讀書，那一天也不能生活的。」最後魯迅向醫師提出了關於治病的條件。

「怎樣的條件呢？」

於是對於醫師的反問，魯迅的回答是這樣的：

「第一，把病看好，把命救活；第二，要是一個月內完全休息而可以看好，那我願意稍微做些事情，而在兩個月裏看好；第三，要是不能看好，沒有方法可以看好，那我希望稍微把壽命延長了一些。」

對於這，醫師也不能回答了。

這裏再稍稍述及另外的一件事情，這就是：在魯迅的晚年，曾會見過野口米次郎和長與善郎的兩個日本文學家。他對於這兩人的寫到關於他的文章，在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三日寫給增田涉的信裏說了不滿意的話：

「和名人還是不見面的好。野口君的文章，把我說的全部都沒有寫，寫出的部份也許爲了發表的關係，也都沒有寫出來。長與君的文章則更甚。我想，日本作家和中國作家的意見，目前是很難融和的。首先，境遇和生活就完全的不同。」（譯文）

接着他又這樣說了：

「森山君的文章讀過了。林君的文章迄未讀過，到雜誌部裏去找，也許是寫了，卻是沒有。」

同時，比這較早地在前年九月十二日，寫給胡風的信裏，對於龜井勝一郎的文章這樣寫着：

「龜井的文章，立意的大部分是在給他們國內的人看的，當然不免有『借酒澆愁』的氣味。其實，我們有些主張，是由許多青年的血換來的，他一看就看出來了，在我們裏面卻似乎無人注意，這真不能不『感慨係之。』」

又在這一時期，他常常和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會面。他會在民國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兩次向「改造」雜誌直接投稿，而這時候，他又和山本實彥約定，選出蕭軍等幾名中國新進作家的作品介紹到「改造」雜誌上去。

然而魯迅的病勢在八月裏更惡化起來，吐出了血痰，到十月則又轉佳，體重八十八磅，和八月一日比較增加了二磅，因為天氣也好，所以常常出去看看電影，或者去拜訪友人，十月八日他還去看第二次全國木刻畫移動展覽會，十七日又去拜訪內山完造，然而這一天的夜裏，病勢突然改變，開始劇喘起來。

等待天亮的魯迅，親自寫了一信（日文）叫夫人拿到內山完造那裏去。

老板左右：

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因此，已不能踐十點鐘的約，很對不起。拜託你，請你打個電話請須藤先生來。希望快點替我辦！

信是像右面那樣的，所謂約會，乃是在內山書店和旁人會晤的約會。

內山完造用電話打給須藤醫師以後，立刻到了魯迅的住宅。魯迅在右手裏拿着香煙，坐在臺前的椅子裏等着，臉色異常蒼白，老是痛苦地喘息着。內山和魯迅夫人輪流地按摩着魯迅的背部。但卻沒有什麼效驗。因此他（內山）拿出自己用雞蛋油做的喘息藥出來，有一次，他曾經勸過魯迅飲這藥品，魯迅不肯飲它，這次便又試勸他飲。魯迅終於飲了。然後內山勸他休息，但他說一躺下來更是痛苦，所以依舊坐在椅子裏，常常搖動着身體，把上半身豎得筆直。這時候還不離開香煙。內山要他停止吸食，這才丟棄了煙頭。這期間醫生來了，立刻在右手上注射。但經過二分鐘後卻仍舊不見效果。

「怎麼攪起的，總是沒有效果。」魯迅說。醫師略等片刻，又在右手上注射了一針，於是呼吸才漸漸地稍覺暢快。內山說在八時店裏有約會，便回到店裏去了。須藤醫師便暫時和魯迅談着話，但這裏，得到電話通知的周建人來了。他詢問須藤醫師，知道沒有到危險的境地，不久便約定明晨再來而回去了。後來須藤醫師也打算請福民醫院的松井博士來診察，所以也出去了。可是松井博士因為星期日已到外面去，沒有方法請來。剛巧石井醫學士偶爾到內山書店去，聽到魯迅的病狀，便來拜訪魯迅，並診察了他。

從須藤，石井兩醫師的口裏知道了病態的嚴重，便請了看護婦每隔二小時注射了一次，並關照內山在呼吸困難時即令吸入氧氣，於是內山，把這些準備了以後又來了。

在這樣的時候，魯迅卻還沒有忘記他自己的工作。

這一天，因為知道連載着他的譯文「死魂靈」的「譯文」雜誌的廣告將在報紙上刊出，所以他用了氣力，幾次三番地問他的夫人報紙有沒有來，當聽到報紙已來，廣告已刊出，他的譯文也

在裏面的時候，他還問另外有什麼作品，而且他聽了以後還不能滿意，便說：「給我拿報紙和眼鏡來，」他親眼來看這廣告的文字。

內山完造再來的時候，魯迅已睡在牀上了。於是在氣氣發射器裏吸入氣氣。這以後呼吸便似乎暢快了些。

「我的病究竟怎麼樣了！」
忽然，魯迅一半自言自語地，一半詢問着內山似的說。

「最好要靜靜地休養，醫生也說是要讓先生靜靜地休養；所以請不要想什麼，好好地休養一下。」內山說。這裏取出了氧氣管，讓他從氧氣管裏呼吸。於是，好像略感舒服了的魯迅，才似睡不睡地開始睡眠了。

然後內山暫時又回去。魯迅似乎比較地舒暢，繼續睡眠着。

夜裏，內山第三次回了石井醫師來。石井醫師診察的結果，病態依然嚴重。內山打電話叫周建人來，便把醫師的話告訴他，在樓下的應接室裏說話。內山也打算徹夜地留在這裏。

魯迅始終靜靜地睡着。因此魯迅夫人勸內山回去。內山在十二時半回去了。

在夜裏，夫人和建人以及日本人的看護婦輪流地看護着。到天還沒亮的五點多鐘，容貌劇變，似乎停止了呼吸的一般。因此慌忙遣人到內山家裏去請醫師來。但這期間，魯迅靜靜地氣絕了。夫人用手摸摸他，額角和手還是暖暖的，然而呼吸已經斷絕，脈搏已經停止了。時間是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當內山用電話請過醫師以後趕來的時候，是五時五十一分，圍繞在已死的魯迅旁邊的建人和看護婦，都肅然地低伏着頭，夫人則靠在桌子上嚎啕地痛哭着。

第十二章 從萬國殯儀館到萬國公墓

魯迅死了。我的稿子似乎應當和魯迅的死一同在上一章完結。事實上我也打算是這樣。因為在「序章」的開端也已多少說到關於魯迅的葬儀。但現在，我覺得「序章」的介紹過於簡單。雖然這樣說，我卻並沒有把「序章」重寫的意思。這裏剛巧有巴金的一篇文章，它詳細描寫了魯迅的遺體送到萬國殯儀館以後的狀況。現在節錄在這裏以代我的敘述——

在萬國殯儀館裏和一些年紀差不多的朋友過了四天興奮的，又是嚴肅的日子。我從沒有像這樣地破感動過。靈堂中靜靜地躺着一個老人，每天從早到晚，許許多多的人，一個一個地或者五六個人一排地到這裏來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禮。我站在旁邊，我的眼睛把這一切都看了進去。

一個禿頂的老人剛走進來站了一下，忽然埋下頭低聲啜泣了。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已經走出了靈堂，卻還把頭伸進帷幔裏面來，紅着眼圈哀求道：「讓我再看一下罷，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靈堂裏燈光是不夠明亮的。一羣小學生恭敬地排成前後兩列，一齊擡起頭，癡呆地望着那一張放大的照片。沒有一個人說話。空氣是十分嚴肅的。忽然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埋下頭鞠躬了，其餘的人馬上都低下頭來，有的在第三次的鞠躬以後，還留戀地把他們的頭頻頻點着。孩子們的心是真摯的。他們知道如今失掉一個愛護他們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邊還彷彿響着那個老人的聲音。

我所認識的一個雜誌社的工友意外地來了。他紅着臉畏怯地在靈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敬敬行了三個禮，然後悄悄地走開了。

兩個穿和服的太太低着頭，閉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禱告了一會，當我給她們拉帷幔的時候，我瞥見了她們的滿是淚痕的臉，過後在帷幔外面響起了悲痛的哭聲。

我的耳朵不會誤聽的，像這樣的哭聲我每天至少總要聽到幾次。我的眼淚也常常被他引了出來。

我的眼睛也不會被欺騙的。我看見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勞働者，我看見了抱着課本的男女學生，我也看見了綠衣的郵差，黃衣的童子軍，還有小商人，小店員以及國籍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種各類的人。在這無數不同的臉龐上我還看見了一種相同的熱誠的表情。這一切的人都是被這一切的心從遠近的地方牽引到這裏來的。

在這些時候我常常想：這個被我們大家敬愛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夠相信。但是這些悲感的面容，這些哀痛的哭泣卻明白地告訴我。這個老人決不會再坐起來，帶着溫和的笑容對我們高談闊論了。

二十一日的夜晚，已經過了十一點鐘，我和幾個朋友預備動身回家，靈堂裏十分靜寂。我一個人走到靈柩前面，靜靜地站立了四五分鐘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燈光，透過了那玻璃棺蓋，癡癡地望着我所熟習的那張臉。眼睛緊緊閉着，嘴也緊緊閉着。一種溫和的表情籠罩在這臉上。沒有一點死的恐怖，彷彿這個老人就落在深沈的睡眠裏。在這四周都是鮮花紮成的花圈和花籃，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氣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胸。我不禁想着這難道不是夢？我又想：倘使這個老人一翻身坐起來呢。

但是一個沈重的聲音在我的心上叫起來：死了的不能夠復活了。

死者的遺體是在這天下午入殮的，我跟着許多朋友行了禮，過後，站在人叢中，等着遺體入殮。前面一片哭聲刺痛着我的心。我忍受不下去，含了眼淚回過頭來，無意地看見那頰長的朋友紅着眼睛伸出手拚命在另一個朋友的肩膀上抓。我半年前因為某一件事情還寫過文章攻擊這個朋友，但這時看見他心

裏難過，我的心也更加難受了。在這一刻滿屋子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都有着一樣東西，這就是——死者的紀念。(中略)

我不能夠這樣地久站下去了。瞻仰遺容的人開始接連地來。有的甚至是從遠地方特地趕來看他們所敬愛的人的最初的也就是最後的一面的。「讓我們多看幾眼罷」，當我拉帷幔的時候，常常有人用眼睛這樣地懇求。但地方是這樣狹小，後面等着的人又有那麼一長列，別的朋友也在催促。我們怎麼能夠使每個人都多看他幾眼呢？在這裏的短短的一瞥裏，那無數的人是深切地感到他們的損失了。

下午兩點鐘靈柩離開了殯儀館。送殯的行列是異常有秩序的。許多人悲痛地唱着輓歌。此外便是嚴肅的沈默。

到了墓地，舉行了儀式以後，十三四個人擡起了靈柩。那個剛剛在紀念堂上讀了哀詞的朋友，突然從人叢中跑來，把他的手掌也放在靈柩下面，這情形把我也深深地感動了。我想至少在這一會兒所有的心都被躺在這靈柩中的老人連接在了一起的。

靈柩上覆蓋着一幅旗子，這是民衆代表獻給死者的。上面有三個大字：「民族魂」。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靈柩是愈來愈重了。那個押柩車來的西洋人跑來感動地用英語問道：「我可以幫忙嗎？」我點了點頭。他默默地把手伸到靈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經是傍晚了，大家把靈柩放下去。一個架子上縛着兩根帶子，靈柩就放在帶子上面。人拉帶子，靈柩緩緩地落下去。我站在旁邊被後面的人擁擠着。在暮色蒼茫中，我只看見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漸漸地往下沈，等牠們完全停住不動時，人們就把水門汀的墓蓋擡來了。一下子我們就失去了一切。

儀式完畢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了出來。沒有燈光。在陰暗中羣衆像潮湧似地開始散去了。……

(下略)

這裏，我想稍稍添加一些具體的事實罷。

在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間的往弔魯迅的人據說超過一萬，參加二十二日送葬的人，據說在七八千以上。

扶持靈柩者是黃源，姚克，孟十還，蕭軍，歐陽山，聶紺弩，胡風，周文，吳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張天翼，曹白等接近魯迅的十四位文學家，執紼者是友人郁達夫（特地從福建趕來的），鄭振鐸，王統照，夏丏尊，葉聖陶，許欽文，蕭乾，沙汀等數十人。

行列的最先，是作家蔣牧良和歐陽山手執着的寫有「魯迅先生殯儀」的白布橫額，接着是樂隊，輓歌隊，花輪隊，輓聯隊，司徒喬畫的大幅的遺像，其次是肖像車，靈柩車，後面跟着的是五列縱隊的送葬的羣衆，蕭軍擔任行列的總指揮。

行列在騎着腳踏車和馬匹的工部局的西洋人和印度人的巡邏監察下，在中途電影公司的攝影隊旁，蜿蜒地連續着，哀悼歌的合唱的聲音震動了天地。

到了墓地以後，葬儀委員長的蔡元培宣告閉會，沈鈞儒報告了魯迅的爲人和生活，接着，宋慶齡，章乃器，蕭軍，鄒韜奮，內山完造等演說，然後是胡愈之的誦讀哀詞。在演說的時候，羣衆常被演說者感動的言辭所激勵而不絕地高呼。

這以後，在巴金的文章裏也有的，又由十四位文學家把靈柩搬運到墓穴去。

魯迅著作年表

〔原著中的「魯迅著作年表」是根據增田涉氏所編訂的目錄。增田涉氏是根據「三開集」裏附載的「魯迅譯著書目」，加以增補，並經魯迅先生校閱而成。它和「魯迅全集」裏的「三開集」末尾附錄的「魯迅譯著書目」，以及附錄在全集末尾的「魯迅譯著書目續編」合併比較，略有出入。這裏的目錄，是參照三者增補而成，並且把已經被編入其他單印本的，或同時包含旁人作品的著譯，加以註釋。特此附記。——譯者〕

一九二一年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M·阿爾志跋綏夫作）中篇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

一九二二年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曲。餘同上。

愛羅先珂童話集（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雲（俄國V·愛羅先珂作）童話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吶喊（短篇小說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國小說史略上冊（改訂之北京大學文科講義。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悶的象徴（日本厨川白村作論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印行所同上。後合上册爲一本。一九三一年出版訂正本。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五年

熱風（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評。其中多半是以隨感錄爲題，刊載在「新青年」雜誌上的。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說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華蓋集（短評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續集（短評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說舊聞鈔（係輯錄關於小說史資料的舊文，間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隨筆選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刊」之一，後歸北新書局。）

一九二七年

墳（一九〇七至二五年的論文及隨筆。未名社印行。）

朝華夕拾（回憶文十篇。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作。是以「舊事重提」爲題連載在「莽原」上的。未名社印行「未名新刊」之一，後由北新書局印行。）

唐宋傳奇集十卷（纂輯校錄唐宋傳奇，並於卷末附有札記。分上下二冊，由北新書局印行，後合併一冊，由聯華書局印行。）

一九二八年

小約翰 (荷蘭 R. 望·譚寧作長篇童話。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後由生活書店印行。)
 野草 (散文小品及詩。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間在「語絲」雜誌上刊載的。北新書局印行。)
 而已集 (短評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 (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選譯。印行所同上。)

一九一九年

壁下譯叢 (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術史潮論 (日本板垣鷹穂作。印行所同上。)

落谷虹兒畫選 (并譯題詞。朝華社印行「藝苑朝華」之一。)

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 (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店印行「文藝理論小叢書」之一。)

藝術論 (蘇聯 A. 盧那卡爾斯基作。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〇年

藝術論 (俄國 G. 蒲力汗諾夫作。光華書局印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文藝與批評 (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水沫書店印行同上叢書之一。)

十月 (蘇聯 A. 雅各武萊夫作長篇小說。神州國光社收稿爲「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一九三二年

藥用植物 (日本刈米遠夫作。商務印書館收稿，分載「自然界」中。)

毀滅 (蘇聯 A. 法捷耶夫作長篇小說。三開書屋印行。)

一九三三年

三開集 (短評集之五。皆一九二八及二九年作。北新書局印行。)

二心集（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雜文。合衆書店印行。）

拾零集（一九三三年將「二心集」之刪餘者印成。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三年

豎琴（蘇俄短篇小說選集，計十一篇，內三篇爲他人所譯。良友圖書公司印行「良友文學叢書」之一。）

一天的工作（蘇俄短篇小說選集，計十二篇，內二篇爲他人所譯。良友圖書公司印行同上叢書之一。）

一九三六年與「豎琴」合訂成冊，書名爲「蘇聯作家二十人集」。印行所同上。）

兩地書（與夫人景宋女士合著。是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二七年一月，一九二九

年五月至六月間往返的書簡。北新書局印行。）

僞自由書（短評集之六。是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在申報「自由談」登載的作品。青光書局印行。）

一九三四年

南腔北調集（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雜文集。同文書店印行。後歸聯華書局印行。）

准風月談（短評集之七。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間在申報「自由談」登載的作品。興中書局印行。

後由聯華書局印行。）

一九三五年

錢（蘇聯班台萊夫作童話，原載譯文，後由生活書店出版單印本。）

死魂靈（俄國果戈理作長篇小說，原載「世界文庫」，後收入「譯文叢書」。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俄羅斯的童話（蘇聯M·高爾基作童話。「文化生活叢刊」之一。印行所同上。）

門外文談（文學論文集。天馬書店發行「天馬叢書」之一。後編入「且介亭雜文」。）

惡魔（蘇聯高爾基作的短篇集。青光書店印行。內包含他人的譯作。）

一九三六年

故事新編（取材於中國古代傳說的創作短篇集。一九二二至三五年作，共八篇。「文學叢刊」之一。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俄國契訶夫作短篇小說。「文藝連叢」之一。聯華書局印行。）

花邊文學（短評集之八。皆一九三三年作。聯華書局印行。）

一九三七年（遺著）

夜記（收自「且介亭文集」，從一九三四至三六年雜文十四篇。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魯迅書簡（與友人書信。自一九二三至三七年函札六十九封，三開書屋印行。文化生活出版社總代售。）

且介亭雜文集（一九三四年雜文，三開書屋印行。內山書店總代售。）

且介亭雜文二集（一九三五年雜文，餘同上。）

且介亭雜文末編（一九三六年雜文，餘同上。）

著譯以外，又有所編輯者，爲：

莽原（週刊。北京京報附送。）

語絲（週刊。所編爲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後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書局印行。）

奔流（自一卷一冊起，至二卷五冊停刊。印行所同上。）

文藝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冊。大江書店印行。）

譯文（月刊。自一至三期。生活書店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爲：

故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印行「烏合叢刊」之一。）

心的探險 (長虹作雜文集。餘同上。)

飄渺的夢 (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餘同上。)

忘川之水 (真吾詩選。北新書局印行。)

魯迅自選集 (自選舊日創作二十二篇。天馬書店印行。)

海上述林上下卷 (瞿秋白譯著論文及小說等。與友人集資，以「海上樓霜社」名義印行。內山書店代售。)

蘇聯見聞錄 (林克多蘇聯遊記。光華書局印行。)

蕭信納在上海 (就樂雯尉貼翻譯并編校，再加校正者，野草書屋印行。後由聯華書局印行。)

魯迅雜感選集 (何凝編。何凝即瞿秋白之別名。北新書局印行。)

士敏土 (蘇俄革拉特考夫作。蔡詠裳董紹明合譯。為「世界新文藝譯叢」之一。新生命書局印行。)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蘇聯聶維洛夫作。曹靖華譯。「文藝連叢」之一。聯華書局印行。)

解放了的堂·吉訶德 (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戲劇，易嘉譯。「文藝譯叢」之一。印行所同上。)

尼采自傳 (梵澄譯。「良友文庫」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所校訂，校字者，為：

蘇俄之文藝論戰 (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十二個 (蘇聯A·勃洛克作長詩，胡敬譯。餘同上。)

爭自由的波浪 (俄國V·但兼珂等作短篇小說集，董秋芳譯。餘同上。)

勇敢的約翰 (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間故事詩，孫用譯。湖風書局印行。)

夏娃日記（美國馬克·吐溫作小說，李蘭譯。湖風書局印行「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所校訂者，爲：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說。朝華社印行。）

小小十年（葉永泰作長篇小說。春潮書局印行。）

窮人（俄國F·陀思妥夫斯其作小說，韋叢燕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黑假面人（俄國L·安特萊夫作戲曲，李寶野譯。餘同上。）

紅笑（前人作小說，梅川譯。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H·至爾·妙倫作童話，許霞譯。朝華社印行。）

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行。）

浮士德與城（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戲曲，柔石譯。神州國光社印行「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靜靜的頓河（蘇聯M·峻羅詞夫作長篇小說，第一卷，賀非譯。餘同上。）

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蘇聯V·伊凡諾夫作小說，侍桁譯。餘同上。）

阿Q正傳（日譯本，山上正義譯。）

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增田涉譯。）

落花集（王誌之作短篇小說。初版後校訂本。）

打雜集（徐懋庸著雜文集。生活書店印行。）

集外集（楊霽雲編魯迅作一九〇二至三三年雜文。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

豐收（葉紫著短篇小說。「奴隸叢書」之一。容光書局印行。）

八月的鄉村（田軍著長篇小說。餘同上。）

生死場 (蕭紅著中篇小說。餘同上。)

所校勘者，爲：

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 (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遺，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 (校明「叢書堂鈔」本，并補遺。未印。)

所校字者，爲：

桃園 (「譯文叢書」，弱小民族短篇集之一。茅盾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所選定者，爲：

一個人的受難 (麥綏萊勒作木刻連環圖畫故事。「良友木刻畫」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小說二集 (「中國新文學大系」之一。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木刻紀程 (中國木刻選集。鐵木藝術社印行。內山書店代售。)

蘇聯版畫選集 (從蘇聯版畫展覽會中選出。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所印行者，爲：

士敏土之圖 (德國C·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印。)

鐵流 (蘇聯A·綏拉非摩維支作長篇小說，曹靖華譯。)

鐵流之圖 (蘇聯I·畢斯凱萊夫木刻四幅。印刷中，未炸燬。)

引玉集 (集蘇聯版畫藝術家十一人的作品。三閒書屋印行。內山書店代售。)

北平箋譜 (與鄭西諦合資印行。)

十竹齋箋譜 (第一冊同上。)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 (據原拓本及藝術謄畫社印本畫帖選出。三閒書屋印行。後由文化生活出

版社印縮本發行。)

死魂靈百圖 (A·阿庚畫，培爾那爾特斯基刻。三開書屋翻印。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

所纂輯者，爲：

古小說鉤沈三十六卷 (輯周至隋散逸小說。未印。)

謝承後漢書輯本五卷 (多於汪文臺輯本，未印。)

所已輯印者，爲：

會稽郡故事雜集 (輯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先賢像讚，朱育

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會先會稽地志八書而成。一九一五年木刻，用

周作人之名出版。)

所輯錄者，爲：

六朝造象目錄 (始自晉代，終於隋代，計十一期造象目錄，未印。)

六朝墓志目錄 (未完成。)

古代漢文學史綱要 (爲廣州中山大學講義，在廈門時原名「中國文學史略」。共十篇，自文字至文章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未完成。)

所未印之著譯，爲：

集外集拾遺 (收集「集外集」所未備者。)

山民牧唱 (西班牙巴羅哈作。原爲「文藝叢叢」之一。)

書簡集 (將與各方通訊全行收集者，約數百封。)

日記 (自民國元年至廿五年逝世前。)

(傳 迅 魯)

又稿件：

死魂靈 (第二部一部分。)

漢畫像，漢碑帖。

(附註) 以上「未印之著譯」欄內，「書簡集」及「日記」二種，將於今年(一九四六)由其夫人編印出版。

附記

「魯迅傳」裏的借用魯迅原文的地方，雖然意思完全相同，但多半改了文字的組織，或者加添了虛字，或者略去了說明，或者把魯迅的說明改作了對話的形式，例如「鄉里生活」一章中，有一段對話是這樣的：

「我搖頭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稅關檢查的時候呀。」

「啊，是的，我對於你們帶來了那樣的女人鞋子實在不明白，那是誰的鞋子呢？」

「這還不是徐錫麟先生的太太底嗎！」

「到東京來，不裝做大腳，而把這樣的東西帶來，又有什麼必要呢？」

「誰也不知道呀，去問那太太自己罷！」

在魯迅的原文裏，前兩句對話是沒有的，只有說明的文字，而後四句的對話則略有出入，現在抄錄在下面：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

(魯迅傳)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他去。』」

類似這樣的差別很多。自然，我們應當原諒於作者的這種敘述方法，因為這樣地活用，可以不致使一篇文藝形式的傳記變成一篇呆板的論文。所以這些地方，譯者的翻譯是依照了日文的原著的。

但也有許多地方，在日文本裏的敘述相當曖昧，而在魯迅原文裏反覺清晰易解，這時候便酌量容納魯迅的原意，必要時還多添了一二句，使敘事臻於完善。

二

也許是由於未能完全理解魯迅的思想和生活罷，作者曲解魯迅的地方相當的多。例如「序章」裏解釋魯迅與中國事變的地方。第四章裏把魯迅的抄古碑和研佛經的工作，誤以為是影響到他後來創作小說的必需的國學修養，因之無怪他在第六章裏，在說到魯迅的反對青年們向古書中去討生活時，更誤以為魯迅思想的不統一了。……但是所有類似這樣的地方，在許廣平先生的指示下，都經一一加以刪節或改寫。

三

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也還有許多是憑空臆測的錯誤，這顯然是由於作者的參考資料的不足以及寫作態度的隨便。例如對於「害馬」的解釋的錯誤。例如在第三章裏，紹興光復以後，代替軍政府並自稱都督的是「王金發」，而不是一「湯壽潛」。第七章裏「漢畫象考」，實際上並沒有

這部書。「序章」裏作者和魯迅夫人會面的時候，海嬰才祇八周歲多，依照中國年齡也只九歲，決不是如原著所說的「十一歲」。又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八日魯迅會覆李秉中函，表示他不願意出國，並且感謝李氏的善意勸行。李秉中是魯迅的學生之一，原著的以爲受命遊說者，剛剛和事實的內容完全相反，這是非常遺憾的。而第五章敘述魯迅和周作人共置的公用庫八道彎的房屋，作者以爲如今周作人的一家以及魯迅的母親（原著出版時魯迅的母親尙未逝世）和妻子必然都會居住在那裏，其實那房屋由周作人一家獨自居住，魯迅的母親卻仍然孤零零地住在阜城門內魯迅自置的小屋裏，一直到她亡故的一天。

但所有以上這些以及類似這樣的地方，都已經刪削和改正。同時，爲了細節的錯誤過多，在改正或刪削的地方都並未加以說明的註解，以免除不必要的累贅。

四

在譯文上，感謝夏巧尊先生懇切的指正，使本書減少了不少的錯誤。

譯者